

思想政治課研究

学术顾问:

吴 铎 邱伟光 夏国乘

编委会主任: 齐卫平

主 编: 曹景文

思想政治课研究

SIXIANG ZHENGZHIKE YANJIU

2021

1

(双月刊)

总第 247 期 2 月 15 日出版

目 次

·本刊特稿·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导向

冯 刚 徐 硕(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赵 莎(14)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文化自信思想探源

丁 愉 韩红蕊(25)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考察

郑 敏 邓红玲(3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个维度

——基于传承马克思精神的视角

郝志强(44)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徐家林 吴亦婧(5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治理效能、现实挑战和机制构建

彭小兰 李良成(69)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机制

仇永民(78)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分类评价:我国高校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差距探究

胡晓丽(90)

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契机、转变与进路

张进 刘广乐(101)

重大疫情背景下运用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孙强(111)

·思政课教学·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实效性研究

王殿文(121)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创新

张宗峰 刘明越(13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教材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史春林 徐绍元(145)

基于“精准”思维提升高校思政课的育人效能

张晓明 郭文君(156)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 教学改革中的实践导向

冯 刚 徐 硕

【摘要】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核心素质,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针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是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和学生发展需求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坚持实践导向,能够更多地着眼于实践,及时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的客观需求、青年学生现实需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转化。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导向,将更多地在实践过程中关注教师和学生实践素质的培养与各种校内外优势资源的集结运用。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导向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冯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875)。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要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进一步坚持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需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结合时代发展特征、中国改革实践以及学生思想变化特点,在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相互作用下实现自身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面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开设的旨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能力的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于培育和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 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人才不论是从思想上和能力上都提出了更“红”更“专”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就是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前提下,通过实践导向性改革,满足新时代的新要求,回应现实中的新问题。

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作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它的开展方式和内容形式直接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应具备什么样的核心素质,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和如何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等重要问题。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要回应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密切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成为了必要和可能。

(一)满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改革是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与国家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在国家综合发展实践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为推动国家改革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个相统一”。^①其中“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在立鸿鹄志,做奋斗者。”^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课程,致力于培养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具有创新发展实践能力,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对于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促进青年学生知行合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更好地符合时代发展特征,推动中国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③面对国家发展实践中提出的更高的教育要求,不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都需要将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改革

迫在眉睫。

因此,坚持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法体系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要求相结合,将思想政治专业人才培养实践寓于国家改革发展实践的大格局之中。

(二)遵循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始终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就是要按照人们思想、行为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特征,结合国家战略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依据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新变化做出新的调整和变革。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始终遵循教书育人规律。这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教书更加侧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教育者自身教育形式、教育方法的改变和教育能力的提升,育人则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具体素质要求和能力要求。教育者要始终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对受教育者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以实践为导向,与实践需求紧密联系,密切回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国家改革发展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始终遵循学生成长发展规律。青年学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受到正确价值导向的引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教育者要始终遵循学生成长发展规律,根据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新特点和新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具有针对性地实施改革,增强青年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精神的理解、认同和信任,最终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帮助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也为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三)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改革创新要坚持实践导向,不仅仅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要求,更是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需求。

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中,还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以课程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单项式灌输教育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被简单化为了单纯的理论教

学,而轻视了实践学习和探索。这样普遍存在的教学模式和大家对思想政治专业课简单认知为理论学习现象,使得学生学习也只停留在理论学习层面上,学生只知道正确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却不知该如何把握,党的理论创新只停留在理论认识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学生的行为实践中。除此之外,从理论的形成到能够指导实践的进程这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理论不能及时地进行察觉、回应和解决,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纯理论教学与实践中的方法论指导产生了脱节,无法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在宏观层面上指导实践的进程,但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微观的、具体的问题,宏观理论无法给出具体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导,以帮助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无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针对性。要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线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理论结合实际,用实际的、生动的、鲜活的案例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提供指导借鉴。

(四)满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发展需求

除了以上提到的现实问题导向外,学生的现实需求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坚持实践导向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培育说到底还是要走向实践的,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受众跨越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多个年级,不同年级、不同研究方向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不论是继续理论深造,进行学科构建还是走向实践岗位,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都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对于理论研究和学科构建的需要来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理论研究和学科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的探索和指导。而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的工作范围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岗位,从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设计者到高校的辅导员、班导师、思政课教师等的具体政策实施者,这就使学生面临着不同的职业选择,不同的职业选择又要解决实践中不同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又和人的思想行为紧密相关。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育者学会科学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解决这些与人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政策要求、内在规律、现实问题和学生发展需要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改革提出了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和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性改革亟待进行。

二、实践导向教学改革的发展与探索

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要具备以下特征：教育者能够结合具体实践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探索中提升学生的理论兴趣，帮助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在客观、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科学理论的滋养，在实践中增强理论理解、理论认同和理论自信，激发其内生动力，最终将扎实的理论功底转化为卓越的实践能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强大的人才储备和人才支撑，使学生能够自觉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迈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探索的第一步。该课程成功将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的切身经验体会和前沿研究成果，教学中将宏观、抽象的理论知识寓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的实践之中，使同学们能够更充分、深入地理解和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一）及时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客观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性改革，具有能够及时了解、密切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客观需求的独特功能。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性改革能够使教育者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践中的理论引导需求，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设计和开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目标设置和课程设计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全面贯彻和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正视实践过程中的理论引导需求，根据理论引导的政策要求和现实需要来设置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形式，用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的理论引导能力，明确自身肩负的理论引导使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深化理论认同和理论自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这一课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制定》这一专题就邀请到了具有丰富政策制定经验的教授为同学们讲解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设计的用意和思路，使同学们结合具体政策的制定深入了解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导向性改革能够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中的实务需求。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要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切实走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将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过程中进行的不断创新和探索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汇总起来，找出共性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及时、迅速地做出察觉和应对，理论与实践交相呼应，共同推进问题的解决和实践的发展。这样既使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得到了及时的反馈与解决，又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实践上升到认识，再通过实践不断对认识进行检验和证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得以丰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也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二）关注青年学生发展的现实需求，解决实际困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性改革具有适应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满足学生发展现实需求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④“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脱离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及现实需求，将会影响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因此，正视、重视、理解学生成长发展需求，是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内生动力的重要内容。”^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就是要改正原有的唯理论、唯教师、唯教材的僵化教学形式，而更多地将重心转移到受教育者身上，也就是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满足他们的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实际困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弥补了现有理论为主教学方式的片面和不足。现有的普遍的、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学形式，使学生的学习单纯围绕理论层面展开，忽视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训练，限制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视野和眼界，不利于学生回应现实问题，培养问题意识。脱离实践谈理论无异于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这样的教学形式下培养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即使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也不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能力，无法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成为空谈。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导向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寓于实践之中，致力于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体悟理论的深邃含义，既注重思维逻辑的构建，又兼顾关切问题意识的培养。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回应了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有些学生基于

对自身成长发展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的考量,学习了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之后,还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以实现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但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并不能满足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的需要,无法向同学们提供实践机会,这就需要在教学改革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对相关实践经历的讲解和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的介绍,使同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岗位,未来还能够向哪些方向探索,能够与其它哪些工作相融合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可以使教育者的身份更加多样化,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能够更多地直接参与到实际教学环节中来,向同学们讲解真实的、客观的思想政治工作案例,使同学们获得更加直观的、切实的体验和感受,以弥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中理论讲解的单调性和片面性。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体现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指导需要。青年学生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者的那一刻开始,面对的就是直接关系到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具体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需要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提供的方法论指导,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重建。为了能在实践中完美地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需要在实践导向性改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与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的对接和联系,以帮助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得到能力的训练和提升,明确学生的问题意识,弥补宏观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的不足。

(三)理论结合实践,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成果转化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具有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转化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相关研究不仅是为了推进理论基础的深化,同时也是为实践领域提供科学指引。”^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实践导向性改革,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科研人员理论研究的应用意识,也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这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方向领域的一线工作者不但为大家讲解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根据最前沿的热点问题形成的解决方案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抽象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同时也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的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思

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提出更加科学的、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法论指导。这些理论成果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实践的总结升华,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不再只是空中楼阁,而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国家改革发展实践紧密相关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学成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在集中优势资源、丰富师资力量的基础之上,比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更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转化,理论密切结合实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构建和理论应用型专业思政人才的培养。

三、实践导向教学改革创新的方法路径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的实践能力,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承担着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目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空中楼阁的现象,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更多地侧重于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提升,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师在一定层面上承认了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就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师的实践能力,让专业课教师都走向实践岗位,真正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一线工作当中去,从教师的意识与实践层面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计之初,就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这样就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计的源头上,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和断层。在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也能够专业在教学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成长发展需要,更加有效地解决自己在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更好地实现自身的职业发展,在实务工作中,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为受教育者树立良好的榜样,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二)注重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自主意识,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导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回应现实需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发展的过程,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教学的同时,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兼顾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育者要注重提高育人能力,着重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中去,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中深

化理论学习、开拓实践探索,培养学生在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主动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眼光和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为具有强烈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社会主义可用人才。

(三)集结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和实践平台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导向性改革,集结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是基础,要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平台,提供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就师资力量来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需要打造一支以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教师为主力、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充分参与的教师团队。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的教学队伍中,涵盖了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党委团委行政工作者、校园文化建设者、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设计者等各个领域的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师团队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能够使专业人才培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不同阶段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为学生们带来思想政治教育最前沿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内容。正因为有了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要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教学设计当中,打破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堂“填鸭式”“满堂灌”的单一理论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打造成为从实践需要出发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专业课程。

从思政人才发展机会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在打造集合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的基础之上,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习、实践机会,使思政人才在接受理论灌输的同时能及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既掌握专业理论又掌握实践技能,让人才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深化理论理解、认同和信任,在实践探索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拓宽视野,提升格局,最终自觉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核心素质就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的深刻把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发展范畴的深刻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既能敏锐地感知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前沿问题,承担起教学、科研的任务,推动学科良性发展;又要具备过硬的实践能力,承担起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坚持实践导向,就是要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通过自身的实践导向改革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话语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导向,就是要在实践过程中提炼、总结、形成、完善学科特质,并将此特质寓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之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将此特质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体会、升华,最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①② 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3-19.
-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④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2016-12-9.
- ⑤ 冯刚.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⑥ 冯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热点研究的实践导向[J].思想教育研究,2020(03):115-119.

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赵 莎

【摘要】为了救亡图存,陈独秀提出了“文化救国”的呼吁和主张,在他看来,只有青年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为此,他全力投入青年工作,着力塑造一代新青年,他所期待的新青年的理想形象是“文化新人”的形象。如今,历史已经演进了一百多年,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理论构设也成为人们探究培育时代新人的初始起点。这一代新青年所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时代新人培育最根本的精神底色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陈独秀;新青年;文化新人;时代新人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编号 19LLZD10)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赵莎,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

以五四运动的发起为标志,塑造一代新青年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唤。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理论构设促使新青年的形象由理想走向现实。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进步分子都曾受到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的影响,逐步成长为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领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陈独秀以及他所影响的一代青年人与我们当代青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接力传承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一、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的产生背景

陈独秀(1879—1942)成长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代,即内部政治社会腐败堕落、外部

面临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反帝爱国、救亡图存是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出发点和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国力迅速发展,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后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八国联军的侵华使陈独秀大为触动,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为挽救国家危亡,陈独秀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从政治改良到政治革命再到思想启蒙的转变,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是他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1897年前后,陈独秀受康梁派《时务报》的影响,接受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新思想,从封建士大夫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拥护者。这一时期,他领导了拒俄运动,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组织了“励志学社”“岳王会”“少年中国”(后改名“青年会”),创建了“徽州初级师范学堂”等,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骨干。1903年前后,陈独秀转向了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实现了第二次思想转变,由“康党”转为“乱党”。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关注对于国民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思想形成并逐步完善。

陈独秀于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与上海群益书社的老板陈氏兄弟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青年杂志》的第一卷第一号于1915年9月15日出版,封面上署有法语“LA JEUNESSE”,意为“新青年”,这也就是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上大批先进分子的《新青年》杂志。在《新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对青年一代提出了六项主张,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予所欲泣涕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①此时,陈独秀已经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和使命完全寄托在了青年人身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陈独秀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青年问题,他认为青年的特点在于他们没有经济基础,因而能够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其它阶级更容易走向革命,而青年的任务就是做各阶级的连锁,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以结成联合战线。此时,陈独秀的新青年思想已经趋于成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捕入狱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在武汉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多次演讲,围绕全民族团结抗战积极动员青年学生投入抗战实践,为抗日统一战线服务。也正是在这一系列青年工作的活动实践中,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致力于解放青年人的思想,塑造一代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历史使命的新青年。这

样的新青年,在陈独秀看来,应该是破除了封建旧文化桎梏的一代“文化新人”。事实上,这也是他文化救国思想的实践展开。

(一)文化新人——新青年的理想形象

在陈独秀眼中,理想的新青年应该具有积极进取、敢于战斗的文化性格,应该是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开风气之先的进步文化群体,应该是具有世界眼光、能够融入世界文化发展大潮的文化新人。

1.新青年具有富于战斗的文化性格

“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②在陈独秀看来,青年的“病夫”体质与性格是中国被帝国主义随意侵略羞辱的最大病根。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青年大多面红体壮、威武凌人,他们有着顽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而中国的青年却大多没有朝气与活力,满脑子想要做官发财,丝毫没有创新精神,性格懦弱而自卑。1903年,陈独秀在安徽爱国会演说时,对当时各国瓜分中国的原因作了尖锐的剖析,他认为国人不敢反抗、甘为亡国奴的懦弱性格助长了各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绝不敢多言”,^③“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④“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⑤陈独秀认为这样的青年根本不可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他告诫青年要改变消极孱弱的性格,“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⑥他呼吁青年要把战斗、进取的精神内核淬炼成自身的文化性格,使敢于战斗的精神成为青年人的实践品格,而不是处于绝境时才被逼作出的无奈抗争。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陈独秀呼吁青年要“敢于战斗”,一方面是倡导青年要敢于同国内的封建腐败势力以及顽固势力作斗争,另一方面,也倡导青年要敢于同外国的侵略者作战斗,不能甘当亡国奴,被外国侵略者随意欺侮。

2.新青年是开风气之先的进步文化群体

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复古思潮在中国再次泛滥蔓延,这使得陈独秀认识到,要救中国,第一要务是引导青年解放思想,使青年一代树立起现代性的精神风貌,使他们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禁锢,成为开风气之先的进步青年。“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⑦在陈独秀看来,青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它如同清晨初升的太阳,如同艳丽灵动的早春,代表了朝气和希望,进步的新青年应

该是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文化群体。而中国现存的政治观念、经济观念、道德观念,有很多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合理部分。青年必须要在头脑中打破认为传统观念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思想偏见,抛弃旧观念中不适用的部分,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创造新观念,树立新精神。具体来说,陈独秀认为青年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青年要批判、拒斥传统儒家的三纲教义;其二,青年要破除迷信邪说的蒙蔽;其三,青年要同顽固派、同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作斗争。陈独秀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与他接受进化论有关。他认为青年之于社会,就如同新鲜活泼的细胞之于人的身体一样。青年只有敢于开风气之先,排除社会上腐败的、无生命力的事物,勇于接受和创造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事物,才能使社会获得生机与活力。这就如同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法则一样,“新青年”的“新”就在于它和“旧”的对立,在于新青年敢于解放思想的创造者精神,在于新青年除旧布新的探路者精神,在于新青年勇于革命的先行者精神。

3.新青年要能够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大潮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⑧在陈独秀看来,新青年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要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轨迹。为此,陈独秀要求青年们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方面,他呼吁青年廓清愚昧,以科学代替迷信。陈独秀热忱地向青年介绍欧美自然科学的成就,号召青年们积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指出“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值广阔。青年励乎哉!”^⑨另一方面,他呼吁青年摆脱封建伦理文化的束缚,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陈独秀提出青年要适应现代经济生活,就必须培养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他认为欧美现代国家都是以个人独立主义作为根本,而中国传统孔教的三纲五常培养的多是依附人格甚至是奴性人格,青年们必须要推倒偶像,养成独立人格。此外,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陈独秀号召青年要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了解世界革命形势,关注世界革命的发展,融入世界革命的潮流。他告诫青年当今世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广大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否则将无法图存于世界之中。

(二)振兴中华——新青年的历史使命

在陈独秀看来,青年一代是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的希望和动力,新青年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救亡图存、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

1.青年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动力”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迫切想要找到一种可靠的革命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陈独秀看到了青年学生所特有的革命热情,认为青年群体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因此,他把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了青年人身上。“真正醒觉挺身出来努力于社会全般改造的只有少数青年”,^⑩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觉醒的,为了救亡图存,他们在社会上奔走呼号。而其它的社会阶级基本都处于麻木冷漠的状态,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毫不关心。因此,在陈独秀看来,青年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生力军,青年关系着“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要救亡图存、挽救中国,青年的责任十分重大。此外,陈独秀还提出,要改造旧中国,必须把青年塑造成为不同于“旧青年”的“新青年”,这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认为革命所需要的新青年既要有健康强壮的身体,也要有健全活泼的思想,青年能否“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和责任”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而青年学生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为此,陈独秀主张青年要做到三点:其一,青年要杜绝做官发财的思想追求,确立真实新鲜的精神信仰;其二,青年要明白自身担负的历史责任的重大,唤醒其它各阶级为救亡图存共同奋斗;其三,青年要明确国家为何、明确所选择的政体良否,要在政治上自居于主人地位,实现彻底的政治觉悟。在陈独秀看来,惟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适于今世之生存”,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动力”。

2.“新青年”要建立“新国家”

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要建设一个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幸福的、社会。在陈独秀看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必须具有土地、人民、主权这三大要素,“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人民“不受他种人的辖治”。他认为,如果国家失去了主权,那么即使土地不被侵占,政府没有更换,也是“山海易主”。随着陈独秀思想的发展演变,他所主张建立“新国家”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为人民谋福利的“惟民主义”国家的本质追求从未改变。陈独秀认为,爱国心和自觉心是立国两大要素。为了建立新国家,他号召青年人要在头脑中首先确立起现代国家意识,不能“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他告诫青年“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⑪要在思想上明白“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的道理。另外,陈独秀教育青年要振作自强,改变“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的思想,了解“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家卫国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家卫国的,其国

必亡”^⑫的规律。他告诫青年如果人人都等着靠天命,束手待毙,不尽人力,振作自强,那么这样的国家必然逃不过亡国的命运,青年必须要有保卫国家的自觉。

(三)青年教育——塑造新青年的主要途径

陈独秀以救亡图存为出发点,注重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引导青年树立起个人观念、法治意识、实利思维等,从而塑造出一代新青年。为此,陈独秀提出了“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通过学校演说、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1.“爱世努力”的人生观教育

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对于人生观的看法直接影响着其是否能够摆脱封建旧思想的影响,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为此,陈独秀对于青年一代的人生观教育极为关注,希望能够引导广大青年树立起“爱世努力改造主义”的人生观。“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⑬为回答这一问题,陈独秀对各个阶级的人生观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哲学家的人生观虽然道出了部分人生真相,但是容易走向极端,不利于人们的集体生活;宗教家的人生观是迷信、不科学的;封建传统“做官发财”的人生观是落后腐朽的,是青年一代应该抛弃的。陈独秀教育青年要摆脱这些享乐主义、厌世堕落的错误人生观,告诫青年“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⑭此外,陈独秀还指出,青年应该确立正确的人生幸福观,一是青年要认识到毕生的幸福皆由青年时代造就;二是追求的幸福应该是身体强健、职业正当以及名誉称实等,而不是一心想要做官发财;三是个人的幸福不能损害国家社会的福利;四是自身的幸福不要依赖于他人创造,应该靠自身努力;五是不要贪图一时之乐,以眼前幸福换未来永久痛苦。他告诫青年,真生命不在于人生在世的长短,而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为社会所留下的永恒的价值。

2.实现“伦理觉悟”的道德观教育

在陈独秀看来,青年要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就必须摆脱旧伦理旧道德的束缚,树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格。他认为,传统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实质上是一种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为此,陈独秀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⑮“基于独立基础上的平等”是陈独秀对青年人进行道德观教育所期望实现的理想人格。其一,就个体自身而言,陈独秀推崇节俭、诚信、正直的道德品质。他认为这些品质具有现代意义,青年应该把其纳入自身的人格结构。因

此,他呼吁青年节俭朴素,发展实业,这样既能防止人格的贪婪堕落,又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呼吁青年要讲究诚信,因为缺乏信用,现代经济就难以发展;他教育青年要真诚正直,杜绝虚伪奸诈,通过正当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其二,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陈独秀主张,个人的一切行动和信仰都应该听命于自身固有的智能,而不隶属于任何他人。他认为每个个体生来就是独立自主的,没有奴隶他人的权利,更没有以奴隶自处的义务。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应该平等相处。其三,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陈独秀主张青年要保有“持续治本”的爱国观。他告诫青年学子要改变“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国民劣根性,要有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发展。同时,他也教育青年要理性爱国,他认为爱国并不是简单的为国捐躯,这种行为是值得敬佩的,但却是治标不治本的。他引导青年“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⑩他认为唯有人人做到“勤、俭、廉、洁、诚、信”之数德,才是救国之要道,才是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的爱国主义。

3.“学习马克思的行为”的实践观教育

陈独秀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进行实践观教育,他多次号召青年要敢于实践,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学习。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陈独秀就告诫青年不能“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1920年,他又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呼吁青年要“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藪安乐窝……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⑪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号召青年要“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他认为青年要学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是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二是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的精神。他教育青年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目的是要将其运用到实际活动中,多干社会革命的运动。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陈独秀再次教育广大青年出了监狱就要进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极大鼓舞了青年投身革命运动的热情。在陈独秀革命斗争精神的鼓舞下,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陈独秀为此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指出湖南籍黄克强、蔡松坡等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在毛泽东等青年人身上复活了,号召广大青年人学习毛泽东等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三、陈独秀塑造新青年思想的当代价值

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一种新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代表

了一种前瞻性的立场。受陈独秀新青年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后来很多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近代革命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经过百年的社会发展,回顾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思想,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一)从“文化新人”到“时代新人”

陈独秀塑造新青年的思想促使一代“文化新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在转向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后,陈独秀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又提出了“无产阶级新人”的思想构想,实现了“新人”塑造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此后,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进程中都面临的时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新人”观,呈现了由“文化新人”到“社会主义新人”再到“时代新人”的历史演进。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关于青年培养和塑造新人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培养“新人”的标准就是要“又红又专”,首先要理想信念坚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还必须要精通专业技术和文化知识本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又将“新人”的内涵进一步凝练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即思想道德觉悟高,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强健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新形势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和标准,同时也更加强调“新人”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江泽民将培育“新人”的教育理念发展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强调了美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胡锦涛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强调新人要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品德高尚、意志顽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党的教育方针的集中表达。一方面,就“时代新人”的内涵而言,其一,“时代新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人”教育目标的传承与发展;其二,时代新人是对于新时代“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回答,是人才培养目标的新定位,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标准的补充与完善。另一方面,就“时代新人”担负的历史使命而言,时代新人既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核心力量,

同时也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责任感,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力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

(二)从“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文化新人”到“社会主义新人”再到“时代新人”,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新人”培育的具体标准随着中心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新人”培育的初心却不曾改变,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为了实现中国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而接续奋斗,担当起从“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接起了民族复兴的接力棒。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他强调新青年要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复活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⑧这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民族复兴历史层次的理论雏形。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青年一代始终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新青年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广大青年“为祖国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创新。”^⑪

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对青年一代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指出,青年要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时代新人”。与党和国家在以往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不同,“时代新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青年一代要担当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号召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⑫民族复兴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目标,当代青年将参与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时代新人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能力素质,更要能够保持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时代新人要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把握时代机遇、引领时代潮流,以不懈奋斗的精神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让民族复兴梦想在新时代青年的接续奋斗中成为现实。

(三)从“身体思想健全”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陈独秀看来,新青年与旧青年的区别不在于年龄的差异,而在于身体是否强健,思想是否健全。他认为青年的“新鲜活泼”是破除社会“陈腐朽败”的良药。而青年的“新鲜活泼”包括身体和思想两个方面,身体上的“新鲜活泼”是前提,思想的“新鲜活泼”则是根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青年发展的要求也愈加丰富和具体。从“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②3}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江泽民将“美”增加到新世纪的育人目标中,提出了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②4}由“劳动者”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转变也表明了这一时期育人目标由“为无产阶级服务”转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将“劳动教育”纳入育人目标,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标志着党的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从三要素到四要素再到五要素的发展历程。就“德”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指树立工人阶级的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则主要指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进入新时代,主要指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爱国情怀和国际意识。就“智”而言,建国初期主要指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生产技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素质教育理念的确立,主要指培养青年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入新时代,则更加强调要培养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掌握核心素养以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就“体”而言,体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指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增强体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的内容又逐渐增加了培养技能、锤炼意志、身心健康等多元化的内涵。就“美”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美”的育人目标很长时间里处于缺位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美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开始注重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质,培养人们的健全人格。就“劳”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劳”的理解还局限于体力劳动的含义,后来逐渐拓展到广义的认识,开始强调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身体力行,通过劳动增长才干,弘扬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

- ①⑤⑥⑦⑨⑬⑮ 陈独秀.独秀文存(上)[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1,15,4,26,6,105,27.
- ② 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53.
- ③⑫ 丁晓平.陈独秀自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25,29.
- ④⑭ 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2,4.
- ⑧ 陈利明.陈独秀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73.
- ⑩⑰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43,35-36.
- ⑪⑯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9,421.
- ⑬ 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 ⑱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489,1633.
- ⑲⑳㉑㉒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7,277,277,278.
- ㉔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0.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文化自信思想探源

丁 愉 韩红蕊

【摘要】文化自信关系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和国运兴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深刻地阐释了文化自信的内涵、价值及其重要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自信思想。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他在河北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方的政治实践和文化探索密不可分,这条地域线清晰地勾勒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发展脉络。正定是习近平从政起步的地方,他在正定时期的文化探索与实践,开启了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萌芽阶段。在正定时期,习近平对正定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文物古迹的保护、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正定文化的传播,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地方实践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源;正定时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丁愉,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韩红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 200030)。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在多个场合经常提到的高频词。“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①

任何伟大思想的形成,都与创造思想的人的主观想法息息相关,与其经历的一切社会活动及其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密不可分。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习近平先后经历了正定、福建、浙

江、上海等地方的政治实践与文化探索,这条地域线清晰地勾勒出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发展脉络。1982年,习近平主动请缨从中央机关下潜基层工作,三年期间,习近平先后担任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启自己的政治旅途,迈出了治国理政的第一步,“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②习近平如是说。在正定时期,习近平始终思考的是如何为正定谋发展、为正定百姓谋幸福、为正定文化谋振兴。习近平对正定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文物古迹的保护、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正定文化的传播,开启了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萌芽阶段。

一、文化反思:请缨下潜正定基层一线

从陕北梁家河村进入最高学府,从清华毕业到穿上军装,再从中央军委到河北正定,习近平所做的一个人生选择,背后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七年知青岁月让习近平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疾苦,上山下乡期间,习近平个人及家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正是出于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知识分子肩上重任的清晰认识,他主动请缨从中央到地方。这一选择体现了习近平“从基层做起”的决心,“为百姓办实事”的初心以及“带领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首先,七年知青的经历让习近平深刻了解了中国国情,深知农民的艰辛与穷苦。习近平毕业后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他觉得在机关单位工作和老百姓离得太远,很难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难以对具体事情产生作用,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习近平下基层工作的愿望渐渐变得愈发强烈,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办实事、影响人。^③习近平选择以“下基层”的方式来报效祖国,这是因为“基层,才离群众最近,才最接地气,才最能感受社会的脉搏,才最能认知社会。”^④同时,习近平认为自己在陕北的七年,自己的知识和工作经验都是从农村积累而来,农村正值改革前沿,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⑤

其次,习近平在自己青年时代经历了十年“文革”全过程,“黑帮子弟”的帽子、别人的非议,家庭成分不好等问题给习近平的成长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革”以阶级斗争为首要任务,忽视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导致经济停摆,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习近平亲历了这场浩劫,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担心历史悲剧的重演,担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再度毁于极“左”的人手中。因而,在改革初期百废待兴之时,习近平作为“有了觉悟的人”选择挺身而出,身体力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第一线。^⑥此外,“文革”结束后,有些知青的父母得到平反,许多人对自

已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习近平不满于身边的安于现状、注重物质享受的状态和氛围，重新思考自己这代人的使命与社会责任。^⑦

最后，习近平选择从中央到基层，更体现出一名新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担当与情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承，是“学而优则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习近平身上的体现。习近平下基层前向陶海粟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⑧陶海粟认为，习近平从政不走捷径，从县一级起步打下基础，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习近平的坚定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习近平的远大抱负和政治使命。

然而，习近平辞去机关工作来到正定，这个基层锻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82~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的这几年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十年“文革”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挫折和损失，一切事务都是百废待兴。其中，最难消解的是留在人们思想中的“文革”余毒，一代人的思想观念深受“左”的禁锢，难以得到解放。

1978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⑩但是，身处内陆地域的正定，相对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势头，改革开放的进程显得略有滞后。改革开放在内陆地域表现为“不紧不慢，安于现状”，正定的干部在思想上也更为保守，对一些新观念、新信息的接受远远不够，落后的陈旧观念一直支配着当地人的思维和行动。习近平预想推动的改革面临各种阻力，无论是在降低粮食征购额从而摘掉正定“高产穷县”的高帽，还是在鼓励发展多种经济，鼓励农民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尤其是在制定和推行“人才九条”的过程中，都面临了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都源自于领导班子和当地人民长期受到“左”的思想束缚。

习近平认为，“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么都干不成。”^⑪因此，转变干部观念是当务之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给大家讲沿海地区发展现状、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改革开放的新理念。同时，习近平大力抓干部的素质教育，优化正定县的“上层建筑”，改变干部的传统思维模式。^⑫人的思想观念的更

新迭代,不仅受制于社会的物质条件,同样也与文化教育程度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会随着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而变得越来越高。因此,在正定期间,习近平在改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同时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加大教育投入。社会的发展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相统一的协调发展。人的思想得不到解放,改革开放的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文化自信更是无从谈起。

二、文化延续:挖掘资源保护历史文脉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历史是文化之根,是文化产生的土壤和活动的舞台,所有文化都是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所说,“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习近平在河北正定期间形成了重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历史文物,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极为热爱正定,视正定为第二故乡,他说:“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为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⑬初到正定,习近平就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古迹,细品文化。^⑭习近平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注重文化人才以及保护传承正定的历史文脉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下足了“绣花”的功夫。

正定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源远流长,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美誉,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定有独特的历史建筑雕塑,包括隆兴寺、临济寺、摩尼殿等,也有著名的铜铸大悲菩萨、五彩悬塑观音像;正定也哺育了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单枪匹马出入百万大军的赵子龙,有顽强抗敌、以身殉国的杨粹中;文化名人有宋代工程家怀丙,金代诗人蔡松年,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白朴等。一部正定史记载的著名人物,举不胜举。^⑮虽历经战争年代与岁月侵蚀,但仍有丰厚的历史建筑保留下来,这在习近平看来,是正定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历史,也是每一个正定人应当保护、传承和发扬的历史文化资源。

习近平同样重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他为正定人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定人民为自由解放而战斗,“反帝雪耻会”“各界沪案后援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成立;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定儿女浴血奋战,猛追穷寇,拿碉堡,夺炮楼,两次攻克正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⑯王志敏这样评价习近平,“对于历史文化,若说他是根植于心,对于

革命传统则可说他是脉衍于情了。”^⑩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有着天然的革命文化基因，对于革命传统有着至高至纯的情感，他指示修缮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玉华鞋店，“在他提议下，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岸下惨案发生地、赵生明烈士牺牲地等革命遗址，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立了碑碣、置了匾额，以培树不忘国耻、弘扬传统的正气，激励同仇敌忾、强我中华的精神。”^⑪ 怀揣着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缅怀，习近平挖掘整理正定的红色文化资源，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红色文化传承下去。

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主体是人，因此，习近平极为重视人才资源的挖掘与吸纳。他在正定推出“人才九条”政策，向全国发布“招贤榜”，建立“人才楼”“招贤馆”，吸引了各地人才奔涌而至。第一，习近平重视老干部资源。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打天下，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咱们一生也学不完。”^⑫ 习近平对于干部的真感情源自对革命精神的崇敬之心，革命精神必须传承下去，革命文化必须发扬光大。第二，习近平善于挖掘专业人才。习近平得知国家文物局的杨烈工程师要到正定修缮古塔的消息后，前往隆兴寺会见商谈，并聘请杨烈为正定县顾问团成员。习近平与贾大山的深厚友谊广为传颂，习近平将统一战线贯彻到底，善于吸纳党外优秀人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破非党人士只能担任副职的惯例，把他直接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⑬ 习近平高度赞扬贾大山在文化事业的辛勤付出，“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等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⑭ 第三，习近平善于培育后继人才。习近平不仅爱栋梁之材，也爱基石之材，他将有志青年李拥军的习作转交文化局长，还亲笔复信以资鼓励。^⑮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他认为“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⑯ 在正定时期，面对文物遭到破坏，当地百姓、领导干部对于历史文物、古迹等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的现实情况，习近平带领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加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文化理念。习近平视文物为国宝，认为：“保护和修复文物，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⑰ 习近平在隆兴寺院西侧看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批评：“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

就会愧对后人。”²⁵张银耀回忆道：“过去正定的古塔，都没有围墙，缺乏保护。还有很多古建筑，任由风吹雨打，无人管理，无人看护。……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对正定的文物做了比较大规模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包括很多古建的刷漆、彩绘、维修，现在这些古建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²⁶习近平离开正定后，依然非常关心自己的第二故乡，多次回到正定指导工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近年来正定古城保护工作。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²⁷文物古迹承载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习近平在正定初步萌发的这种历史文化意识，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始终一以贯之，最终成为了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一个支点。2016年，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²⁸

三、文化初探：文化旅游助力经济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旅游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交流文化、传播文明、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旅游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一个综合性产业。²⁹20世纪80年代，正定县发展所制定的政策是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³⁰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思路。习近平强调在对正定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挖掘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正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以历史文化为基础的旅游兴县战略，为正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凸显了文化助力经济发展的功能。同时，习近平大力推动正定文化事业建设，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首先，习近平统一县委班子意见，推动荣国府的修建项目，大力发展文化历史旅游产业。1983年，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习近平等同志谋正定长远发展，借此机会建设实景“荣国府”，为正定县打造一个永久性的旅游景点。习近平在故宫博物院依托专家王璞子找到了《红楼梦》宁国府、荣国府的示意图；红学家冯其庸曾考证出曹雪芹祖籍河北正定，给了习近平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³¹但因资金问题班子成员之间产生较大分歧，在吕玉兰同志的工作下，县委最终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全县旅游点的门票总收入每年都达1000多万元，旅游业已成为正定县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³²

其次，为了更好地促进旅游业，习近平推动正定当地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把正定打

造成距离石家庄最近的旅游窗口。习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 201 路公共汽车,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而且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③ 习近平还修建了停车场等设施,把大佛寺这座千年古寺打造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据统计,1985 年到正定的游客数量已经突破 50 万,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此后,封神演义宫、西游记宫、军事俱乐部、旅游机场等旅游景点接连在正定地方落地建成,不仅丰富了正定的文化旅游产业,也大幅度地助力了正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正定的文化是最好的,历史积淀也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展旅游业,不应该失掉这个机会。

20 世纪 80 年代,习近平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思路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他并不计一时一处的短期利益,而是对正定未来谋篇布局,统筹规划。习近平全局性地提出兼顾发展餐饮、住宿、娱乐等第三产业的配套建设,只有“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④ 开创了“旅游业正定模式”。习近平在离开正定之前,不忘叮嘱继任的县委书记,给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意见,建议正定县委班子要统一思想,将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⑤

最后,习近平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在习近平看来,精神文明建设并非脱离实际生活的虚空形式,“搞精神文明建设,实实在在是造福人民的好事”。^⑥ 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建设。在习近平的努力下,正定县建立了文化站和文化中心,实现“四有”,即有专职干部、有活动场所、有活动经费、有活动项目;逐步建立起了图书室、游艺室、影剧场、体育场,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举办农民夜校,开办文化、技术培训班,大力普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根据群众的传统习惯,组织各种专业和业余文化团体为群众演出健康愉快、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⑦

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发展使人民在劳动之余,精神上得到了享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一直常抓不懈、常抓常新,从正定延续到福建、浙江、上海,再到中央,随其身份的变化,对于精神文明的认识不断升华,政治站位、大局意识不断提高。2012 年,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是多层次的,包括两个文明的同步发展。从正定开始,习近平始终履行着让人民物质富足起来、精神健康起来、生活幸福起来的庄严承诺,这同

新时代所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四、文化传播：讲好正定历史文化故事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大力挖掘正定历史文化资源,不仅给正定的干部群众带来了自豪感,同时也将正定文化传播出去、推向全国,让更多人知晓正定、了解正定、热爱正定。习近平在《正定大事记 1949—1983》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为本记作序,意想以之为一声激情的呼喊,呼喊人们更加珍爱正定的历史。”^⑧ 弘扬正定历史文化,讲好正定故事是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在正定时期的地方实践,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前奏曲。

为了弘扬正定历史文化,讲好正定故事,习近平投入大量精力,组织人员编写《正定古今》一书,并作序表达对正定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习近平在序言的开篇就提道:“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的人民。我爱自己的故乡,更想了解这里的一切。”^⑨ 习近平通过回溯正定的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迹、独特的名胜古刹,高度赞扬正定的英雄豪杰与文艺大家,充分肯定了正定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百折不挠和顽强拼搏,尤其肯定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定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定人民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在新的形势下向新的目标迈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使正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⑩ 正定的历史和文化是其文化自信的来源与底气,正定的人民是其文化自信的主体,唯有熟悉历史,才能深刻认识文化,唯有深刻认识,才能自发产生自豪感,才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正如习近平所言,“正定,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正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正定古今》《正定大事记 1949—1983》两本书的编订与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正定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正定风采,彰显了正定地域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为讲好正定故事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表率。他书写了《知之深 爱之切》代序、《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等文章。随着《知之深 爱之切》这本书在全球范围的发行,正定这座古城的历史文化也走向了全世界。此外,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习近平著有《摆脱贫困》一书;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有《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两本著作出版发行;在任总书记之后更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汇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谈话、演讲等内容,用最直接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声音,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五、结 语

正定是习近平从政的起点,也是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萌芽阶段。作为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将正定作为治国理政的试验田,其文化自信思想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习近平对正定文化的热爱,对历史资源的挖掘,对文化人才的尊重,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对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对文化事业的推动,给正定人民带来了自豪与自信,这同样是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最生动的历史写照。探究习近平正定时期文化自信思想的来源,对于深入了解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内涵及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9.
- ②③④⑥⑦⑪⑫⑭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23,144,254,143-144,142-143,126,149-150,247,270-272,272,81,176,128,247,229,54.
- ⑤⑧⑨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76-77,77,77.
- ⑩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
- ⑬⑮⑯⑰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2-3,217,227,248,223-224,19,16,183,215,218.
- ㉟ 习近平.2015年12月20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奋斗,2019(12):5.
- ㊱ 正定县政协文史委.千年正定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 ㊲ 习近平.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N].人民日报,2016-4-13(001).
- ㊳ 李金早.加快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N].人民日报,2015-09-16(07).
- ㊴ 赵德润,高培琦.正定翻身记[J].中国民族博览,2015(02):7.
- ㊵ 冯其庸.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N].人民日报,2016-10-14(24).
- ㊶㊷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厦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196.

习近平关于党的 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历史考察

郑 敏 邓红玲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实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逐渐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思想。深入探寻这一思想体系形成的进程轨迹，有助于全面把握和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理论品格。这一思想的形成，大体可分为萌芽期、始廓期、成长期、发展期及成熟期五个阶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习近平；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历史考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制度治党的百年进程及时代擢升研究”(20BKS17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郑敏，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邓红玲，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600）。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自然离不开对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百年党史的深切回望和凝练总结，也是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实践探索的理论成果和时代擢升。深入探寻这一思想体系形成的进程轨迹，在洞察历史中揭示规律，在把握时代中昭示未来，有助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新时代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基于对习近平工作实践的逻辑考察，本文将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演进历程划分为萌芽、始廓、成长、发展及成熟五个

时期。

一、萌芽期(1969年初—1982年3月)

1969年初至1975年10月,在陕北梁家河,习近平度过了七年的知青岁月。1982年,习近平又主动请缨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沉”到河北正定县。这一时期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萌芽期。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7年,整整7年,习近平的经历是这样一幅流程图:‘反动学生’——‘受苦人’的好后生——团员——党员——大队党支部书记。”^②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习近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成为他思考党的建设的最初源头。

正是这七年,习近平同乡亲们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和最底层的老百姓朝夕相处,深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对老百姓充满了深厚的感情。1984年,习近平在接受蒋丰记者采访时回忆说:“1975年,我到清华大学学习……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兄弟,但再也离不开人民。我要为人民做事情,要同人民唱一曲悠扬的‘农家乐’。”^③在习近平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不到16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一度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要为人民做实事’。”^④离开陕北40多年,习近平和这片土地的“脐带”从未中断。他曾深情地回忆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习近平,将其成长中的所有挫折与困苦的经历都凝练成了宝贵财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可以说,始萌于他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

二、始廓期(1982年3月—1985年5月)

1982年3月,习近平辞去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这份工作,来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一年后,担任县委书记。在正定,习近平开始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并勾勒了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雏形和轮廓。

首先,“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思想建设重教育。习近平在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核心在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是有鲜明立场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⑥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或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习近平提出要用“三个针对”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即针对理想信念薄弱或者丧失的问题,要加强革命精神教育,以此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针对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者误解的问题,要加强党的政策教育;针对缺乏共产主义的精神道德和纪律风格问题,要进行“三热爱”教育等。

其次,“念好人才经”,组织建设重基层。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开发人才是一项具有特殊地位的战略任务,关系四化成败,关系国家兴衰。”^⑦ 习近平坚持从战略高度认识人才,并在实践中用“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渠道开发人才,强调要根据时代发展形势和基层工作需要,大胆“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消除偏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⑧ 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薄弱的现状,在1983年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在调查研究中,正确分析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问题,解决好党员政治立场问题,党的宗旨问题,严肃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要求各单位坚持对如何开展“三会一课”进行普训,搞好“三个对照”,解决基层党组织“宽松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提出要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培养清正廉洁,有担当作为的好干部,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可见,重视人才建设,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最新修订的党章中,专门增加“党支部”这一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党的根本大法的高度赋予了其重要地位和作用。

再次,“县委一班人要遵守六项规定”,作风建设重领导。“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不但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也决定着党的命运。”^⑨ 习近平始终站在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党风问题。习近平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主持制定了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习近平还在全县兴起务实之风,指出:“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有一个突破性变化,就是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⑩ 习近平注意到“文山会海”会影响党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提出要从“文山会海”中彻底解放出来,集中力量抓大事、抓实事。在他的倡议下,正定县开展“效率月”活动,要求“办事讲时效,不推诿、不拖拉、不马虎,自己事自己办,今日事今日毕。”^⑪ 习近平带头执行,经常

骑自行车下乡,跑遍全县 25 个乡镇 220 个村庄,遇到难题敢于碰硬、敢于负责、立即解决。从在正定出台的“六项规定”到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八项规定”,是习近平抓“关键少数”,抓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成长期(1985 年 5 月—2002 年 10 月)

1985 年 5 月,习近平开始了他在福建 17 年多的领导历程。这一时期,他逐级经过五个岗位,思考有关党建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干部‘四化’方针,选拔干部应当坚持五湖四海,冲破狭隘的地域观念”;“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地抓好思想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⑫这既是他对党建工作的感悟总结,也是他对党的建设集中思考的具体表现。

第一,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和基层组织建设。1988 年,习近平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宁德辖属的 9 个县中有 6 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 18 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围绕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习近平不但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富有创见的理念和方法,而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和基层组织建设。习近平指出,真正的脱贫致富不只“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还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⑬要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一定要选好党支部书记,没有一个好带头人,就带不好一班人”。^⑭只有党支部书记选得好,基层党支部才能在思想、组织等方面“靠前站”,才能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一线”作用。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 94% 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不仅如此,宁德人在扶贫脱贫中还收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回望宁德扶贫模式,习近平认为:“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⑮习近平在宁德扶贫的模式、方法和经验,特别是注重发挥政治和制度优势,对于今天贯彻落实中央精准扶贫方针,打赢脱贫攻坚战,仍有重要意义。

第二,高度重视关系“民心向背,生死存亡”的廉政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物质生活不断向好,与此同时,一些干部出现了腐败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党的建设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从严治党、为政清廉是党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针对“改革开放必然带来腐败”的错误论调,习近平深刻指出“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⑯强调“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⑦针对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出现的下海经商热潮,习近平告诫说:“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⑧在如何治理腐败问题上,习近平提出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在于“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⑨据此,他带领宁德地委先后出台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和措施,切实落实了“两公开一监督”等制度。习近平关于制度治党的论述雏形由此发轫。

第三,树立密切联系群众“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在福建工作期间,针对干部存在的互相扯皮、推诿等官僚主义现象,习近平倡导“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四个万家”,树立“拒绝拖延,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彰显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需要制度保证。在宁德,他提出了干部要“四下基层”的要求,即推进信访接待、现场办公、调查研究、政策宣传下基层。到福州工作后,习近平指导制定了相关配套制度文件,实现了“马上就办”工作作风的常态化、制度化。到浙江工作后,他继续大力推行这些制度,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不光听‘唱功’,而且要看‘做功’。”^⑩“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⑪在宁德,习近平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工程,帮助几千户村民改造了世代居住的茅草房,帮助船民在岸上修建了住房,过上了“下海打渔、上岸居住”的安乐生活。在福州,为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用水用电问题和棚户区改造等问题,他先后实施了“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马上就办”的工作理念体现了让人民满意的最高价值取向。一直以来,习近平始终以这样的理念要求自己、教育干部。

四、发展期(2002年10月—2012年11月)

2002—2007年,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2007年3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10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直到2012年。通过认真学习、梳理、总结习近平《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中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以及在任职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公开发表的党建论述,不难看出,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始终关注党的自身建设,发表了许多极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创新性的党建论述,内容富有系统性,观点极具创建性。

其一,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2005年1月,在浙江省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报告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理论武装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②之后,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因思想基础不牢导致理想信念淡薄乃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习近平提出“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四真”原则,并针对领导干部理论学习不肯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提出理论学习要有王国维论述治学的三种境界。2007年3月,习近平在刚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即前往党的初心之地学习考察,要求领导干部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头脑”。在4月举行的市委常委学习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领导干部应该经常反思自己,尤其是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确保用党的最新的理论知识武装头脑,指导行动。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7个月零4天,稳住了干部思想,重振了精神情绪,巩固了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其二,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干部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始终是习近平对党的组织工作关注思考的重要内容。在干部培养方面,他坚持在实践中培养,对后备干部强调要多压担子,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和考察。在干部选拔方面,习近平认为,一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擦亮自己的“一双眼睛”、用好集体的“多双眼睛”和制度选人、群众选人汇聚起来,形成一致的用人意见;二要坚持正确的选人标准,把那些党性好,愿意为民干事能干事的人选拔出来;三要把“欠发达地区、工作复杂的地方、挑战性强和困难较多”的领域,作为选人用人关注的地方。在干部考核方面,习近平要求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提出要看GDP,但不能唯GDP;既要GDP,又要绿色GDP;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的发生等。在基层党建方面,习近平强调要把基层干部队伍选拔好、培养好、建设好,让基层干部更好地工作;要给予基层干部情感上的关怀,工作上的支持;要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做好基层领导班子的选配工作;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

其三,改进党的作风,坚决反对腐败。从小节入手加强作风建设,是习近平论述党风建设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指出:“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从一点一滴中自觉完善自己,懂得是非明于学习、境界升于自省、名节源于修养、腐败止于正气的道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③习近平强调执政者能否立德、修德、践德,能否保持良好的党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着政权的稳定与否,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

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②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展的系列作风建设,在习近平早年的党建实践中就已初见端倪。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领导开展了以群众满意为导向的“作风建设年”活动,强调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作风建设的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作风建设的第一需求。”^{②5}针对只表扬不批评的“老好人”式领导干部,习近平指出:“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事业的需要,是对干部的爱护,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②6}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帮助干部更好地成长。随着反腐败形势的不断严峻,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科学反腐和源头反腐相结合,认真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动因和特点,深刻把握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有效途径,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②7}坚决遏制住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决把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坚决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等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②8}“在党纪国法面前,‘高压线’碰不得,‘警戒线’闯不得”,^{②9}可谓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诸多重要反腐论述的思想先声。

其四,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能不能为百姓干事解难题是涉及领导力水平高低的大问题。习近平强调“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③0}这也是一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习近平曾用好支书郑九万的例子,说明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就在于脱离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③1}因此,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员要培养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努力做人民群众依赖、尊敬的贴心人,要求党员干部要学习和树立五种崇高情感,特别是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立身之本、执政之基的丰厚营养,按照德才兼备要求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素质,提升执政能力。

五、成熟期(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总揽全局的高度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刻的论述。2014年10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一命题。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并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到全新战略高度,成为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标志着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成熟形成。

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践和“四个伟大”现实要求,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两个坚持”“5+2 的布局”的党建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些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著作之中。

一是关于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②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核心就在于做到“两个维护”,提出要健全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并把国家治理体系形象描述为一盘大棋局,指明党中央就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这不仅对于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具有深远意义。

二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围绕“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怎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③等重大政治论断,指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建设的光荣传统,阐明加强政治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强调要尊崇党章,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等方面论述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三是关于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习近平提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革命理想高于天”,^④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等重要论断,指明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共产党人要处理好“信仰”“信念”“信心”问题,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自觉树立和忠实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基本要求,彰显了习近平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

四是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习近平提出了“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重要论断“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⑤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刻阐明了党的组织工作的遵循原则,拓展完善了党的基本路线体系。

五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的重要论断,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落实“八项规定”,连续开展各类各种实践活动、专题教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等,就是要锲而不舍纠正“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让干部知敬畏、群众有信心,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六是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管党治党”等重要论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⑦只有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纪律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才能管住全体党员,激发出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气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严明党的纪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纪律规章,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不断推进党的纪律建设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决心,也推动实现了党建理论、实践和制度的重大创新。

七是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等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思想治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依法依规治党,突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初步构建了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以党章为核心和统领,包含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此外,我们党不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的“立改废”,坚持依法依规治党,并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严格制度执行,真正使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

八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体制机制”等重要论断,强调治理腐败“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惩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③“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④坚持重遏制、强高压、常威慑,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向压倒性胜利转化,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据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坚持重拳出击,把扫黑除恶和反腐败结合起来,不断“强化不敢腐的威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⑤相对廉洁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参考文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
- ②③⑥⑦⑧⑨⑩⑪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243-244,244,1,154,46,22,135,167,167.
- ④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30,431,387.
- ⑤ 黄土高原上的知青岁月——习近平时代选载[N].学习时报,2016-4-7,A3.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05-206,149,163,216,9,27,29,18.
- ⑱ 治国理政显露轮廓——《习近平时代》选载[N].学习时报,2016-4-14.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2006:391,448,449,453.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8,258,263,71,50,216-217.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166.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63.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8.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10.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李海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85.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个维度

——基于传承马克思精神的视角

郝志强

【摘要】 马克思精神是马克思的人格精神与理论精神的统一体,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很好地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理论品质、价值取向、工具理性和世界眼光。这一新思想拥有鲜明的批判精神,立足于人民立场,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彰显出其宏大视野,科学、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精神。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精神;人民立场;传承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及培育路径研究”(YZ2019037)阶段性成果;山东省本科教改课题“青岛黄海学院‘立德树人’的文化创设与强化实践研究”(M2018X128)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郝志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社科教学部助教(南通 226011)。

“人类世界不能没有马克思,不管怎样都得有个像马克思之类的人物出现,有像他一样的才华和能力,至少也得有马克思的某些精神。”^①法国著名的解构主义创始人雅克·德里达

的话展现出马克思精神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精神是马克思的人格精神与理论精神的统一体,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传承马克思精神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精神的传承包括继承马克思精神、创造性转化马克思精神、创新性转化马克思精神。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不断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须用新思想和新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深深扎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在其中彰显出马克思精神在 21 世纪的时代特色,赋予马克思精神以时代性。基于当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研究有某种“贴标签”“教条化”倾向,如果从传承马克思精神这一新研究角度对其内涵、关系进行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以往马克思主义之间内在统一的传承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理论品质、价值取向、工具理性和世界眼光四个维度很好地传承了马克思精神。这一新思想拥有鲜明的批判精神,立足于人民立场,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彰显出其宏大视野,科学、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精神。

一、批判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优秀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是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对其批判进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精神的优秀理论品质就是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在不断的自我批判、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中逐步构建起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的能动批判,更重要的是它强调立足现实进行实践上的批判与超越。由此可见,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既能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能够开创人类社会发展新局面,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新走向。

(一)推进理论创新亟需批判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批判精神,是马克思批判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展现。它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有机地统一起来。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互动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充分展示了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发展。这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创

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照变化了的现实需要,不断对其反思,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深化理论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守正出新,在全面对外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有更加深入的把握,成功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推向 21 世纪,在新时代的中国更加绽放出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灵魂。其次,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反马”或“非马”思潮的斗争中凸显其批判精神。随着实践的发展必须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新发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更好地应对各种“反马”或“非马”言论。同时,通过运用批判形成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以理论批判引领实践批判,从而形成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在新时代中国构建现代性进程中凸显批判精神。新时代中国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清晰地划定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在“吸收外来”的基础上正确分析中国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以“面向未来”的批判精神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批判地汲取其各自精华,加以凝练融合,从而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强大支撑。

(二)进行伟大斗争呼唤批判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经历各种风险和挑战,遇到重重矛盾和阻力。新时代有新情况新问题,有新的特点,必须围绕这些艰难险阻进行伟大斗争。”^③要想科学地把握新时代,实现中国梦,需要进行伟大斗争,这就必须深刻地认识、理解并践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仅仅存在于纯粹的思想精神领域,更存在于实践中,包括对世界的改造和对人本身的改造中。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伟大斗争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实现新发展。进行伟大斗争,首先不能“故步自封”,要敢于向前迈步,同时必须时刻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四个自信”,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老路”,而要做到这样的头脑清醒必须具备批判精神。其次,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是进行伟大斗争的必备手段。进行伟大斗争必须敢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体制机制的弊端,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这就需要彻彻底底的革命与批判精神。再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进行的伟大斗争已不是轰轰烈烈的传统的群众运动,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选择正确的道路,进行意识形态的较量。新时代的伟大斗争离不开马克

思的批判精神,只有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科学的目标与任务,制定更加合理的方针政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吹响了伟大斗争的号角,伟大斗争已经在中国大地全面开展,譬如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扬更加真实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繁荣昌盛;打响精准脱贫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新发展等。每一个领域都是一场硬仗,都需要呼唤批判精神,创新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要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必须准备好应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外交、国防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打好主动仗,人人都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奋斗,勇担责任;做到下好先手棋,防患于未然”。^④

(三)推进自我革命凸显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永葆生命活力,就在于它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秉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才能在革命中浴火重生、在建设中披荆斩棘、在改革中破浪前行。这体现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中国自主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带领人民推进社会变革,首要的就是要推进自我革命。”由此可见,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党,也是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巩固自身执政地位、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党。纵观人类社会发展,任何一个党派,一旦革命意识丧失,必然不会再保有先进性,就会逐渐走向碌碌无为,甚至垮台。中国共产党凭借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深入发展,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的革命意志和批判精神。正因如此,我们党可以永葆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的未来就有了希望,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也就有了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革命党”。这一命题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药方”是发扬民主,邓小平的答案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来讲,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壮士断腕,向腐败宣战,努力形成保障推进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避免陷入历史周期律,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使党的领导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展现出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鲜明政治特色。

二、人民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科学学说,这里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这里的解放是绝大多数人的解放,体现出马克思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起人民至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科学体系,彰显出马克思精神中的人民情怀,赋予其时代化涵义,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

(一)人民至上——凸显新的价值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⑤这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民情怀,是马克思的人民立场在新时代的生动彰显。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诞生之前,旧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机械地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直观地反映客观事物,忽视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否认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类看成是自然的附属品。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旧哲学家们通过逻辑和概念堆叠出来的“哲学世界”是不真实的,现实的“群众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立足于人能动的实践活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促使人类哲学发生划时代的巨变。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和发展规律,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不公正进行严厉的批判。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通过发现剩余价值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努力为人们展现出资本背后掩藏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从而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对劳动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精神中的人民情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中凸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共识。正是在这种价值共识的引领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坚定不移地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人类解放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地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人民性。

(二)人民共享——凝练新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曾强调:“过往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或者说是少数人参加的

运动。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将会是多数人参与的运动，或者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活动。”^⑥ 想要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取利益的目标，必须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马克思曾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摒弃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的，尤其要将通过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少数人的私利这一状况剥离出去，从而实现所有人创造的成果由全体人员共同享有。由此可见，共享是马克思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合理内核和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理念就是为了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目标导向和价值遵循。实现共享发展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发展成果要由全体人民共同享受，让人民群众可以得到实在的利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必须协调推进各个领域的发展，以经济建设推动其他领域建设，使人民群众可以全面享受发展成果；必须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平台，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到创造社会财富的队伍中，实现生产和分配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享命运共同体”。当然，共享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享是践行马克思精神的人民立场在新时代中国的有效实现路径，而这一新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共享理念也是马克思提出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表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精华的集中凝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人民幸福——开辟价值新境界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向导。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出：“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⑦ 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生活，从根本上讲就是幸福的生活。要想实现幸福生活，必须分析制约幸福感的因素，有针对性地解决矛盾，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消除幸福悖论，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曾指出：“过去讲的人民幸福是虚幻的，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必须将其彻底废除，才能使人们享受到现实的幸福。”^⑧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掌握绝大多数资产，无产者受到资产者的奴役和压迫，无产者的活动实质上是在为资产者进行活动，无产者生产得越多丧失得就越多，每个人都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所以，马克思指出为了能够真正地获得幸福，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起不再奴役人的生产方式，实现人人当家做主，从而实现人类进入真正幸福的

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人民幸福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人民既有着更加高质量的文化需求,又对环境、安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提出更高的要求。综上,新时代要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一方面要提升人民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一方面要提供人民满足美好生活的必要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一方面要尽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要为实现人人全面自由发展不懈奋斗。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要时刻关注人民尚且不满意、不幸福的问题,有的放矢地下功夫满足人民的切实需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通过这样建立起来的幸福生活将很好地使人们的美好生活与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有机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精神中人民幸福观的新境界。

三、科学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科学工具理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作为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它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工具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价值理性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工具理性提供合理的实践方法,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现实的重要依托。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⑨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科学方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维度,从而形成新的治国理政方略,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传承了马克思精神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是我们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其方法论的运用。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它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特”就特在中国的实际是纷繁复杂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在以往的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应对的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社会个别的情况,又要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国特殊的实践上升到一般的理论高度,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高度一致,既尊重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够找出科学利用规律指导实践的方法。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特殊规律,就是在推进理论创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只要理论创新得好,理论就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分析和解决问题就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成功。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的精神旗帜,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在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的“高楼大厦”不可能离开实践而建立。马克思实践精神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求我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的真理,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最大实际,通过综合分析党情、世情、国情,从客观规律出发,结合社会实际,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克服发展难题提供有效“药方”。最后,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于实事求是。通过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党的十九大提出“八个明确”,而要真正落实必须坚持“四个伟大”的实践;通过对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十四个坚持”,而只有在克服各种挑战的实践中坚持十四个基本方略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形成的新发展理念等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做实做细。因此,在实践中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就不能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二)传承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

当今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走向、人类社会去向何处不够明朗,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人类社会、找准历史发展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始终坚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传承马克思精神的过程中运用唯物辩证分析方法的实质,开辟其新境界。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把握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诠释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深刻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是远大理想,实现这一理想的过渡桥梁就是不懈奋斗,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想信念。他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纲领,实现这些纲领,也就是立足新时代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第二,运用辩证分析法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作出正确判断。判断是否进入新时代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只有综合分析和把握主次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矛盾的质量互变、内外因、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不同的矛盾状况,才能科学正确地把握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而判定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随着旧矛盾消失,新矛盾又会凸显出来,伴随矛盾的转变新时代的内涵又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过程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与逻辑演绎的统一。第三,在运用辩证分析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协调推进并加以落实。创新提供动力、协调是根本方法、绿色是必要条件、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本质要求,体现了对辩证分析法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而新时代以党的十八大作为初始点,凸显出辩证分析的思维,是新时代起点和理论逻辑开端的辩证统一。

(三)传承了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强调:“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认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⑩ 马克思认为,思维方式是正确运用实践理性的结果,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实践本身讨论思维的现实性或者非现实性。新时代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其创造性的智慧明确提出必须保持政治定力,科学研判发展趋势,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步提升创新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这些思维方法正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创新思维就是要转变老旧观念,破除教条束缚,变革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新发展理念等新思想和战略的提出,都彰显出创新思维的光芒。战略思维就是要从长远出发,总揽发展全局,掌握发展趋势,体现出思维方式的整体性、长远性。“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四个伟大”等都是统筹全局的战略谋划。辩证思维就是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事物发展变化,揭示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治的关系等,都体现出辩证思维方法。底线思维就是要具备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要有政治底线和责任担当,充分考虑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守住底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不能违规违纪,不可逾越红线,不能踏入雷区,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综上,在应对时代变局中,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实践理性的思维方法,从而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撑。这四大思维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境界,有利于为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与启迪。

四、宏大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广阔世界眼光

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科学,足见马克思精神的宏大视野,彰显出马克思精神的广阔世界眼光。马克思精神中具有的这种宏大世界视野,不仅仅体现在其思想理论上,更体现在实践方法上。马克思在研究理论和考察社会现实过程中,不是只研究单个的国家的社会发展,而是超越了单个国家限制,打开“世界历史”大门,形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一)紧跟时代潮流,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深邃独到的眼光和思维,深入领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顺势而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黑格尔就预言人类历史最终会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他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以“绝对精神”的运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通过商品这个最一般的元素剖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过程,对资本世界进行严厉的批判,阐明未来社会必然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的限制,人类社会会形成统一的整体。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提出:“民族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使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表现出片面性,随着社会发展,民族越来越不能存在下去,于是乎各个民族的文学就会汇集成世界文学。”^⑬马克思所指的文学并不是单纯地指文学艺术作品,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即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文化,这表明马克思虽身处 19 世纪,但是已经接触到

了 21 世纪的时代本质,揭示出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正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必须紧紧跟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⑭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觉自信。正是把握住这种时代潮流和社会走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过程中,经济上主张合作共赢,大力反对逆全球化;政治上主张反对霸凌主义,提倡和平相处;文化上主张学鉴并包;生态上提倡生态文明新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马克思精神的世界眼光,明确中国的立场”,^⑮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整套理论,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找到了通向光明未来之路。

(二)保护文化多样化,促进世界文明互学互鉴

世界文明的多样化来自于各个国家、民族不同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代世界已不同于马克思生活的世界,“当代世界是一个更加关注特殊性的世界,尊重、鼓励和保护特殊性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趋势。”^⑯文明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资本的过度追求,使得掩藏在资本内部的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这就使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构建为我所用的世界,通过资本对世界各国进行奴役和压迫,妄图使整个世界都从属于资本主义,并且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认识论、制度等推广至全球。马克思曾讲:“资本家的商品价格越是低廉,越能够对外入侵,从而使商品成为征服他人、颠覆政权的强力火炮。”^⑰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世界凭借资本的优势地位以及自身文明的高度优越感,使资本主义国家一以贯之以先进文明自诩,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价值理念、社会制度等当作是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圣经”,“充分展现出资本主义奉行的文明霸权主义。”^⑱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独断论,习近平总书记强烈指出:“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道。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各个国家都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要尊重和保护世界文明的多样化。”^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文明无优劣、高低之分,只是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各种文明都有其优缺点,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进步发展、世界之所以能维持和平安宁,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文明间的交流互学互鉴。这些思想摒弃了资本主义传统文明的冲突对抗的错误逻辑,深化了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充分发扬中国特色,而且要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⑳从而更加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魅力。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文明新发展

当今世界发展局势千变万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缓慢,出现各种危机;发展中国家崛起路上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各个国家竞争激烈导致的传统安全问题较为突出,世界各国发展中遇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各种赤字充斥在各个国家发展中,“整个人类世界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必须建立新的全球治理观念和体系。”^⑳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观念和治理方案,既谋划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宏伟巨幅,又指明了“人类社会走向何处”,中国的智慧和方案已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精神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立足于当代世界发展实践,倡导全球各国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全球治理的视野更加宽阔,为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指明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它不是为单个国家、民族、地域谋利益,而是为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的利益出谋划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制定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为世界各国普遍赞同,原因在于它“传承了马克思精神的宏大视野和世界眼光”。^㉑ 当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反映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广阔的世界眼光,更是全球各国人民共同需要付出的实际行动。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寻求新的全球治理之道,引领人类社会新发展,解决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和平发展、有效治理等问题。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付诸于实际行动,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六大走廊”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时局变化提出的,既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需要,又能够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综上所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彰显了马克思精神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支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体”。^㉒ 它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内涵,从而凸显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效能。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对马克思精神不断阐释和传承,才能更好地引

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力。

【参考文献】

- ①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 ③④⑤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28,21,17.
- ⑥⑧⑨⑫⑬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691,499,35,36.
- ⑩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4.
- ⑪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两会金句[N].人民日报,2018-03-20.
- ⑭⑱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上海:外文出版社,2017:417,307.
- ⑮ 范鹏,李新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的马克思精神[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2):5.
- ⑯ 黑龙江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是值得永远弘扬的革命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论述[J].中华魂,2018(04):26.
- ⑰ 本刊评论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J].党史博采(理论),2007(07):1.
- ⑲ 孙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的马克思精神[J].青春岁月,2019(17):393.
- ⑳ 马云志,杨永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J].理论学刊,2019(01):13.
- ㉑ 孙宜晓.葛兰西历史主义思想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 ㉒ 陈豪.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J].党建研究,2018(06):19.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徐家林 吴亦婧

【摘要】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两个根本性问题,并内在地包含着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至上,坚定“四个自信”。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编号:18J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徐家林,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亦婧,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1620)。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贯穿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作出了明确而科学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

是其他什么主义”；^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深化研究、深刻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首先就要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基本内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的?其本质如何?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渊源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流”,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形态。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有其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为批判对象,立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在对“空想社会主义”扬弃的基础上,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同样不可避免这一必然规律,以及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没有也无法给出明确而具体的描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④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对其基本精神的理解是相同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⑤

最根本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唯物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依据和动力来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即来源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是我们及时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藩篱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使我们能够自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正确把握生产与分配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重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价值创造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公平公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的远大理想。习近平特别重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强调指出：“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⑥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要求“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两个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和途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其基本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政党，才能最终完成其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质，也有其独特的中国特色。

其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思想纷呈，流派众多，目标各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它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国国家建设和治理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属性，决定其首要“特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丧失其本质属性,滑向别的主义;而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必然滑向教条主义。恩格斯曾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明确现成的方案,只是指明方向,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任何违背这一点的做法都会走向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并日益彰显活力,就在于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不断创新,逐渐走出一条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那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在哪里呢?除去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和建设社会主义采取的具体政策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⑨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巨大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有信心有能力随时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问题。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应对实践挑战,回应人民要求,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当前,我们正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三,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然要求我们的理论和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我国国情和国家建设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根据和事实基础。1987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⑩并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大深刻分析了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明确了现阶段任务的基础上,继承原来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在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分阶段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正处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完成、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创新放在国家建设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并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正确决策。

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问题之间,合乎逻辑地内含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回答:“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⑩道出了中国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解决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夙愿。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国被动地从古代社会被推入近代社会。西方列强为了在华获得利益,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对于中国来说,这些战争的重要结果是,经济上,外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政治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得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进逼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遭受西方的压迫、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命运,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夙愿。为挽救民族危亡,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在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选择向西方学习。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先后开展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从技术、制度、文化,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但是,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技术,还是其先进的制度和理念,都未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未能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自强。但是,中国人民是聪

明和智慧的,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继续寻找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强盛从来都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模仿他人而实现,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中国人民需要先进的理论,也需要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但更需要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当中国人民正困惑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何以不能拯救中国的时候,俄国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选择。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走上了以俄为师、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平坦。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道路就十分曲折。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面临十分复杂而险恶的环境,对于既弱小又缺乏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水平也不高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免不了犯各种如冒险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这些都导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这些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正确地开展革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并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经过多年的艰苦求索,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通往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那就是:中国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联系中国国情进行;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没有资产阶级议会道路可走,中国人民没有表达诉求的和平途径,只有走暴力革命道路;近代中国是农业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城市工人力量弱小,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反动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城市,敌人在农村的力量相对薄弱,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开辟出一条指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同样,今天的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立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经过短暂恢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于1956年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如何成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同样没有经验,仍需向榜样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其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中国的平等态度和经济援助,都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们选择了苏式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计划和重点发展重工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确有其优势,使我们国家在几乎没

有任何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的情况下,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苏式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问题。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试图计划一切,其实超越了现实可能;过于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与人民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工业生产没有得到应有发展,使得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人民生活脱节,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发展,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经济逐渐失去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一直难以实现。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我们党也开始意识到简单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在对过去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实行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⑫此后,党不断探索,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实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无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道路都是根本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过很大弯路、遭遇过严重挫折,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相当成功。于是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相互否定。这无疑是对历史的人为割裂,容易滑向历史虚无主义,十分危险和有害。割裂历史,就会导致或固守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理论和政策,否定改革,僵化拘泥;或把改革视为否定过去,完全脱离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已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就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改旗易帜。实质上,这些认识都是没能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其结果当然也就无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而是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艰辛探索得来的。正确的认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成果,没有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和成果,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也不能因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原则和前一时期党的社会主义探索成果的坚持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但也是以前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基础。割裂历史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更不能推动中国前进。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之路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⑬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用事实来说话、由人民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使许多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⑭历史和事实都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辉煌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改革与建设的实际,也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和底蕴。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同根同文且以国家形式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魂与根。中华文化显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深植于积淀深厚、绵延久远、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中华文明之中。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⑮

三、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目标的胜利实现依赖于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很好地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新时代,我们要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首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归宿,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的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创设,更谈不上坚持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⑥} 这既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事实的概括,也是对当前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要求。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才使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最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了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也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失误和挫折中走出来,走上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国“领导一切的”力量。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没有中国改革和建设成功。事实上,在中国,任何重大事业要想获得成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面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①⑦}

其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同时,基本原则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时空条件,不针对特定国情和时情,因此,我们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将其与当

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唯如此,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再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有其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概括为十三个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挥其显著制度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有生命力,这就需要不断改革。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只有改革才能坚持之,也只有改革才能发展之。对此,我们党有高度自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中国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定,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短板和弱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还不是很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完善、加强和提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达到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以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使其更有活力和生命力。

又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根本价值。人民至上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此价值指向,所以才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使命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增福祉。彰显人民主体地位、代表和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反映人民基本诉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核心的关切。在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就要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需要。坚持人民至上,就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民至上性,而人民至上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人民利益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人民性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所在。坚持人民性,就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当前中国来说,就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

果,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改革成果,切实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就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此,就要把群众路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不断激发和凝聚人民群众这一推动社会发展之最活跃、最革命的原动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密切联系群众,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在行动上贴近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要求,集中群众智慧,让群众真正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中来。

最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定“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提高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⑧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党中央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⑨坚定“四个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先进理论、科学制度和强大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个自信”,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坚持中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⑩这就要求我们党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领导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方略,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①③⑩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2,21,22,273.
-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0.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 ⑤ 杨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6):16-20.
- 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7-2.
- ⑦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5.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 ⑨ 宋平论党的建设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89.
- ⑩⑫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3.
- ⑭⑯⑰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20,20-21.
- ⑮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4.
- ⑱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36.
- ⑳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治理效能、现实挑战和机制构建

彭小兰 李良成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广泛凝聚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文化支撑。作为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为个体社会参与的规范有序助力,还能保障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有序展开,促进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共享借鉴,破解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媒体融合加速和西方价值观教育复兴的多重挑战,需要推动教育管理者积极作为、加强教师群体教育引导、强化教育对象价值体验以及促进校内组织联动协作,从而构建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和校内组织“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协同机制。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协同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智能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研究”(19BKS099);广东省学校德育科研课题“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路径研究”(2019JKDY048);2019年广东省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哲学基础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彭小兰,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良成,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广州 510641)。

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教育是一项引领个体走向美好未来的公共事业,更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

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①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立德树人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明确规定,也是体现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价值诉求,是对未来教育的发展内容的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教育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的精神追求、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一项培养时代新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融“个人之德、社会之德和国家之德”于一体的“大德”教育形式,解决的是“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准则”的确立问题。当下,国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青年学生受到中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亟待在青年学生中灌输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协同机制建构的探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固然是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因素,但核心价值观本身的理论价值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治理效能生成的内在依据。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途径,能起到“安身立命”和“安邦定国”的重要作用。

(一)核心价值观教育助力个体社会参与的规范有序

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通过教育让群众掌握,可以起到引导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作用,能激发群众的创造力进而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国家作为政治法律文化共同体,对学生参与社会生活进行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引导和组织,可以提高其价值观的认同度,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个体国家认同。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规范个体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个体影响社会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个体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而核心价值观赋予我国政治参与特定的内容。中国语境下个体政治参与的有序展开,与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紧密关联,有利于个体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特色性的呈现。物质生产的改造是精神生产和思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精神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新时代下要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价值观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的引导,促进个体政治参与的有序高效。引导个体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个体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秩序建构的活动,是社会服务实施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微信、抖音等新兴媒体成为当代青年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常用方式,也起到传播价值观和

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需要我们重视网民核心价值观认同对国家经济和公民权利的促进作用,而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价值导航和精神导向,可以促进个体有序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社会系统的有序有效运转。提升个体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个体对自身归属的国家的积极认知和构成国家的政治文化等要素的积极情感。国家认同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最核心的内容。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倡导政府与社会的双向信息交流,提倡个体自由表达和教育主体合理传递、吸纳社会意见,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认同,起到为党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发展赋能的作用。

(二)核心价值观教育保障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有序开展

科技活动、财产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共同构成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离不开良好社会秩序,这也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是与我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同时,它通过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价值共识,通过人的力量创造促进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对科技和经济工作的价值引领。科技和经济工作作为技术性的业务工作,隶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而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政治工作,属于精神层面的工作,隶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相结合,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能激发科技创新动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能避免不当的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逆向作用甚至造成社会发展失序。

促进法律服务资源共享。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法治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具体表现。在我国,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环节及其全过程,一方面将社会广泛达成共识的成熟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彰显见义勇为的善行,惩罚恶的违法行为,严格法律执行,公正司法,使得我国的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轨道。写入《宪法》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共同价值标准,为法律资源共享的实现、法律专业人才素质提高和法律运行效率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指引。在我国,核心价值观也成为了社会征信系统、信用记录、奖惩机制、信用标准等的设计基础,既能健全信用机制,又能惩戒失信、凝聚社会共识。

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国有德则兴,人有德则立。向上向善力量的生成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不仅反映在社会风气上,也体现在个体精神风貌和精神境界上。核心价值观教育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增强主流价值认同,引领社会思潮,促

进个体个性发展;通过弘扬真善美,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营造融洽的社会氛围,提高了个体精神境界。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共享互鉴

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规范的灵魂和精髓、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得以满足的关键考量标准。《周易·贲卦象传》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核心价值观教育能提高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自信,能发挥平衡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共享借鉴功能。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促进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价值共享。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社会的价值实现程度,取决于核心价值观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在国内,当今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政府、社会和学校中各部门既有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念又有共同的国家价值观。通过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倡导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统一价值观,消解各个具体领域价值观的差异,构建政府、社会和学校价值观共享,实现价值观践行的一体化和协同性,重塑个体话语表达方式,规避个体价值失序,提升主体价值认同。

促进不同学校间的师生价值共享。由于地域不同,不同学校之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存在不平衡,通过协作机制促进学校之间的价值共享;由于小学、中学、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差异,通过大中小学教学一体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学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的贯通;由于师资差异、生源差异,不同学校之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由于各个学校信息技术资源的差异,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网络资源共享是一种有效的常见的形式。以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抓手,可以实现不同学校师生核心价值观的共享,从而建构符合现实需要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有效提升师生的价值认同。

促进国内国际价值观共享借鉴。核心价值观极大地满足了国内价值共享的需求,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共享。同时互联网的开放和共享又极大地促进了价值观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际交往过程中,求同存异,文明交流互鉴,提高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提升教育领域交流的主导性,建构国际交往中的社会主义底色,进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观教育互学互鉴提供了相应的价值遵循。

二、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面对社会领域出现了多种新业态新技术和中外教育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的情况,我

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来自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媒体融合加速和西方价值观教育复兴方面的现实挑战。

(一)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对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挑战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影响。

随着人类交往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不仅体现在各种文化下的价值存在不一致，还表现在同一文化内部不同主体的价值存在不同。这样的多元化价值观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出现核心价值观的执行不力、大中小学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衔接性不足以及教育理念路径与教育对象的实际知识和能力需求不适应等诸多现实困境。

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现实社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出现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公平、诚信不足、监督困难等问题，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倡导的价值理念并未能完美实现，出现了教育现实与教育理念之间脱节的问题，不利于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接受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同时，由于当前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核心价值观的大量涌入，西方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存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正确的辨析与引导，很容易出现教育主体对中西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本质差异的忽视，甚至将二者等同的危险。

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由于利益主体价值观念的差异，出现了相比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竞争主体间复杂矛盾，这实际上也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而新出现的矛盾”。^② 企业与企业间、企业竞争力与社会间、企业道德决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不能及时消解，导致社会出现道德与利润的博弈。^③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至上的价值观也广泛存在社会之中。比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社会对科技伦理审查与评估的规范和流程指南的关注，被忽视的科学道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综上所述，价值领域的种种社会问题，影响了个体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削弱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

(二)媒体融合加速对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的挑战

当今教育主体价值缺位的现象，还受到媒体融合加速发展的直接影响。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个人就其社会生存而言，是局限于某种特不确定的环境。”^④

媒体融合是信息时代媒介发展的新理念，包括技术融合和交往方式融合两个方面。媒体

融合是时代所向,也是大势所趋。疫情后,社会数字化程度加深,数字技术融入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改变了人们的交往和消费方式,实现了教育的网上网下深度融合,使得教育信息传播的分众化和市场化趋势明显。

媒体融合重塑了教育主体的生存方式。智能信息技术“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并广泛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促进了技术、社会和历史的变迁”。^⑤媒体技术让人类快速进入“在新媒介上腾飞”时代,自上而下联结与平等互动联结同时并存,亟待健全社会互动机制和教育共享机制。核心价值观在教育工作和决策中的融入相对不足,亟待健全经常性的联系平台、虚实互动环境、开放包容的组织原则、促进社会的动态平衡的机构联动机制。

媒体融合改变了教育主体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准。当今数字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既是馈赠又是魔鬼,延伸了教育主体的认识能力,也影响教育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方式。伴随着各类网络媒体的快速深度融入生活,信息传播变得低成本、超地域、超规模、匿名性和开放性,催生了大量随机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网络价值群体。这些群体组织创建的松散性、不确定性、自由性和制约有限性的特点,加剧了网民价值观的模糊多变性。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而互联网空间的价值标准、价值规范体系和意义系统匮乏,这种失衡冲击实体经济和社会制度,还使得过去常见的信任、尊重等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变得特别稀缺,引发核心价值观教育主体的焦虑甚至交往恐惧。

(三)西方价值观教育复兴对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的挑战

当今网络空间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成为一种趋势,互联网空间存在的大量国外教育信息,使得西方价值观教育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教育产生影响。坚持和发展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色,需要正视中西价值观教育方式的共性和差异性。^⑥

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倡导“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对观点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接受”,^⑦同时西方重视法治约束,互联网法律相对健全,这些社会特点与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集体价值、价值引导、价值灌输形成鲜明对比,重新反思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坚持人民第一,个人第二”^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西方社会存在经济繁荣和价值沦丧的二重性,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也催生了现代病,比如西方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失业、贫困、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败坏,继而导致校园暴力;西方政府丑闻、技术至上加剧了学生对道德约束和价值塑造的教育诉求;新民粹主义蔑视传统价值,追求暴力解决社会问题。鉴于这些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出现价值观教育复兴的现象。

近年在英国,品格教育“在教育政策中得到重生,起到促进社会共识的作用”,^⑨具体表现为出现了系列共同价值课程(精神道德社会文化教育、个人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美国学者认为价值危机是“最严重的智力危机,构成文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⑩在美国,很多高校把通识教育作为调节美国大学生学习危机和社会凝聚性、相容性危机的重要途径。相较于西方,我国的核心价值教育仍然存在理论研究滞后、教师专业人才匮乏、教材教学设备建设滞后以及学生核心价值素质缺失等问题,需要多方位地加强核心价值教育。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科技优势和话语强势,借助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控制权,向其他国家推销和渗透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虚幻的价值观,试图淡化其他国家教育主体的文化认同。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巧实力是胁迫和收买的硬实力与说服和吸引的软实力的结合。”^⑪

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协同机制建构

助力教育对象澄清“追求什么、反对什么”这一问题,需要重视参与核心价值观教育主题的多元化,建构合力育人的协同机制,更好发挥教育管理者引领功能、教师主导功能、学生参与功能和组织互补效能。

(一)推动教育管理者积极作为,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国家引领功能

国家政治引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主要依托教育管理者,比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党委、学生处、宣传部等。教育管理者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起者、引领者、服务者和监管者,具有制度供给、财政支持、实施监管评估和风险兜底方面的责任。党委对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统一领导、整体设计和长远谋划,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格局。作为教育管理者,学校党委要重视在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社会实践、辅导员队伍的建设中进行核心价值观融入,让各方力量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建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互动机制、养成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⑫教育职能部门和学校党委部门的教育管理者要重视对教育对象进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学习的指导。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学校的互联网空间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的规范。宣传部门要不断完善新媒体认证监管、内容审核、舆情监测应对、线上线下协调和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建设,推动媒介技术和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同质与同步。

(二)加强教师群体教育引导,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教师主导职能

学校的领导干部、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 and 教学管理者共同构成教师主体,既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好坏的标识和象征,又是公众对教育认知认同的媒介,是学校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重要主体。面对成人集团的教育示范式微,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发挥教师群体示范作用,发挥教师群体这一成人集团对学生具有天然的示范价值。加大对这一教师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具有关键作用,能起到示范作用。

教育引导教师通过多种方式去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一是主导教育教学过程,通过依托教材内容和结合实际议程设置融入核心价值观。二是教育引导教师直接给学生提供价值知识,树立道德榜样。《礼记·杂记下》说:“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教师开展定制化、大众性、互动性强的慕课教学,并辅之以QQ、微信等社交工具,有效实现师生价值互动。三是发挥教师作为学校和政府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政策解读人的角色作用。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上,教师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掌握得相对全面且具有理论深度。引导教师“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⑬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及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

(三)强化教育对象价值体验,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学生参与功能

学生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接受的重要主体。核心价值观所内含的品质,需要通过学生主动参与学校课程学习加以巩固和强化,通过社会实践增强价值体验和价值认同。比如,通过国际合作项目,让学生在海外学习交流,在文化互动互鉴中增强爱国情怀,培养友善意识。王阳明曾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从哲学上说,学生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参与,进行自我价值建构,达到感性与理性结合、规划力和应变力的结合,提升创造力和幸福感。“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⑭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作为思想观念,本身不能发挥社会效应,需要参加学生在学习体验中才能起到激励作用。所以要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元素。在这两类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师生、生生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辩论,让学生思考每一个核心价值观条目的价值和意义并践行。除了课程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外,还可以通过校园生活进行渗透,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开展以友善为主题的公益活动等。

(四)促进校内组织联动协作,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组织互补效能

学生组织和教师组织共同构成学校组织。学生组织包括社团、学生会、团委等,教师组织包括教师工作部、学校工会、党支部等。这些组织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扮演多重角色,是师生事务民主管理和权益实现的重要平台,能保障学习活动和日常生活,还有利地协助核心价值

观教育。学校组织承载师生员工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充当学校秩序的衍生平台。在学校,学校组织全时空为师生提供公共服务,还从细微处培育师生的价值素养。学校通过教育引导、宣传舆论、文化渗透和实践养成等途径,“用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宣传最美人物,弘扬最美精神”。^⑮

因此,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和校内组织有机配合、各自优势的发挥是科学高效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前提保障。只有核心价值观教育整个过程按照既有的制度运行,促进各种力量的互补、互融和联动,才可能有机整合教育资源,促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用最大化,使青年学生广泛接受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保障。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 ②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1).
- ③ 彭小兰.国家、企业、公民:企业竞争力的道德机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 ④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8—19.
- ⑤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
- ⑥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02.
- ⑦ [英]莫尼卡·泰勒、万明.价值观教育与教育中的价值观(上) [J].教育研究,2003(05).
- ⑧ 侯惠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我们的哲学坚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
- ⑨ James Arthur. The Re-Emergenc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British Education Policy [M].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2005.53(3):239-254.
- ⑩ Allan David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p[M]. Boston: Simon & Schuster, 1987:346.
- ⑪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M].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XIX。
- 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在增进认同上下工夫——访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陈延斌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
- ⑬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4-26(1).
- 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
- ⑮ 靳玉军.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要求[J].教育研究,2014(1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机制

仇永民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体现了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和实践机制辩证统一的创新架构。其中,哲学基础、思想前提和理论原则建构了理论体系创新的思想机制,认识客体、认识主体和发展观念建构了理论体系创新的认识机制,内在根植、外在借鉴和内外融合诠释了理论体系创新的文化机制,现实基础、双重批判和功能指向注解了理论体系创新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实践机制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BKS007)。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仇永民,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1306)。

机制源自机械学,后被其他学科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意指在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审视的基础上分析其构成元素并揭示各构成元素之间互联互通的内在机理。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其生成都有内在的创新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其生成体现了创新的思想机制、认识机制、文化机制和实践机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思想机制

哲学基础、思想前提和理论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基本遵循,也是其

逻辑起点。

(一)思想机制的哲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其他理论成果一样,都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下列哲学原理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所内含的四个理论创新成果的生成,都是以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先决条件的。二是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地位和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原理。通过总结、概括、抽象和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生成的理论体系,又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的行动指南或行动纲领。三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无论是“历时性”社会形态,还是“共时性”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渗透其中、伴随始终的共性矛盾。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国情又决定了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或矛盾的特殊性。四是与英雄史观相对立的群众史观。从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成败标准,到江泽民将“实现人民利益”定格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到胡锦涛彰显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为民情怀,再到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群众史观立场。

(二)思想机制的思想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样,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前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打破思想藩篱,摆脱固有观念、做法和制度的桎梏,“重构”或“新构”是非判断标准,把人们从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解放思想的空间有多大,创新的空间就有多大。解放思想的过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也是理论体系生成的过程。这一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创新“起始点”。针对粉碎“四人帮”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人们思想严重僵化的情况,邓小平大力呼吁和倡导解放思想,提出了著名“摸着石头过河”理论,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探,敢于走人迹不至的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四次解放思想的讨论或争论:一是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二是1992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三是1997年关于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四是2005-2007年关于改革的争论。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事求是，即立足实际、探求事物内部规律、把握事物本质。因此，实事求是是在解放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其灵魂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次全会的一个标志性历史功绩就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这条思想路线，我们党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抽象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从本质上说就是体现时代性、合乎规律性、富含创造性。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格，也是其创新的内生动力。这一理论体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而发展的、开放的、革命的理论系统。求真务实的实质体现为探求规律和在规律指导下的真抓实干，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和重实践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创新，紧紧依靠求真务实。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多次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就是求真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和最好诠释。

（三）思想机制的理论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作为其中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单独理论一样，都具有特定的理论原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从整体性视角相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从构件视角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同源性。贯彻理论原则，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正确认识、准确解读和理性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前理论”。随着场域的更换、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具体词句、具体论述等，可能会逐步失去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其基本立场、精神实质、理论品格、核心理念等不会过时，它们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理论“硬核”永远在场，我们必须坚持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予以发展。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理论原则不能丢，特别是贯通在其中的立场、品格、方法和理论“硬核”。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一再表明，只有真正认识、解读和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品格和方法，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这一理论原则，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现有的四个理论成果中，无论是作为“元理

论”的邓小平理论,还是作为“继生理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无一例外都是坚持理论原则的结果,也是承继其立场、品格、方法和理论“硬核”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是对新时期、新阶段、新时代实践的抽象、凝练、升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源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前理论”在坚持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认识机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成所围绕的中心主题,这一中心主题又具体化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该问题指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该问题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党的自身建设,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该问题指向发展质量与发展观念,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个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上述三大理论创新成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凝练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括,开启了以整体性、体系化视角审视与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崭新范式。第四个基本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问题指向全方位、多角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八大以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应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四个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述四个基本问题及建立在这些基本问题基础上的四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为围绕中心主题所进行的层层递进式逻辑展开,蕴涵了对认识客体、认识主体和发展观念的深化把握。

(一)认识机制的客体向度

在客体向度上,伴随着对认识客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渐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发展、接续发展、体系确立、进一步完善等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和失误,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存在严重

误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未能搞清楚、没有解读好、无法回应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从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入手,通过对十个“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否定性界定,逐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通过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原则的阐释,进而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具体特征与本质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递进和对“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动态追求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新世纪新阶段,江泽民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向度去探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化了对上述根本性理论问题的认识。在继承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认知与解读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①的重大判断,延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从“本质特征”这一外显性层面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②

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宏观性认识、总体性把握、全局性标识的思想集合与理论凝结,是在实践中不断催生出新思想、新观点的基础上,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提出并确立了“新思想”的指导地位,为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元素。对这一体系的理论定位,经历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理论体系和制度、再到文化的提升过程,反映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渐进认识图景。至今,这一认识图景已穿越了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空。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中,他最早从道路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回答了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道路、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九个方面进行归纳,表明党开始体系化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经历了“开始萌生——初步发展——接续发展”的不断积聚过程。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进行了提炼,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开始萌生”。党的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获得“初步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战略思想囊括于理论体系之中,理论体系得以“接续发展”;同时首次把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确立的三个理论成果作为整体来看待和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提法正式出场,“体系确立”。党的十八大把理论体系与道路、制度并列,从“道路——理论体系——制

度”三个维度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了诠释新架构。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其指导地位;二是在“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维架构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文化”之维,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增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③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认识机制的主体向度

在主体向度上,伴随着对中国共产党这一认识主体自身建设规律理解的渐次深化,在党的建设等涵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完善与丰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单边主义的障碍中艰难演进,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在摩擦冲突中曲折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硬实力竞争日益激烈,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交流、交融与碰撞此起彼伏,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多变,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话语权渐进提升。新世纪初,我国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开始迈向全面小康和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逐梦道路上也渐行渐远。要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强国目标、达成千年复兴梦想,“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④另外,我们党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存在一些与时代、社会发展和党自身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激发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执政忧患意识,开始重新审视和认识自身的状况、所处的客观环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担负的历史责任等,进一步探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课题应该如何回应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从地位、任务、执政条件和环境等角度科学定位了党所处的历史坐标。从党执政意识觉醒的思维路径上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我们党也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并把党的性质定位为“两个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表征着党的执政意识的新觉醒,表明党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逐渐深化了自我认知。理论体系中的四大理论成果分别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萌发出民主、法治、创新、人本、开放、整合、忧患、大局、科学发展、自我革命等执政意识。执政意识的觉醒和彰显主要体现在党逐渐深化了对执政的理念、方略、基础、方式、机制、能力、环境和资源的认知与实践,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历代领导人从严治党思想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注重“全面”,创新和综合运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整套管党治党的“组合拳”,继承和发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努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一基础性建设,着力建好干部队伍,持续开展作风建设和高压反腐,巩固实施铁的纪律,不断扎牢制度笼子,使党的建设成效显著。党的十九大集中概括了新时代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新要求,号召全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更加坚强有力”地带领人民实现强国梦想和复兴梦想。

(三)认识机制的发展观念向度

在发展观念向度上,实现了从传统到科学的转向,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蕴涵。

作为发展问题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发展观念是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联系起来的思维媒介。发展观念有传统与科学之分,其中传统发展观把发展狭义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仅仅理解为GDP增长,忽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秉持着传统发展观或受到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时代课题的认知、思考与回应所展现出来的发展轨迹。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科学发展观的接续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再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及其接续发展的理论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观及其接续发展的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实践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及其接续发展的理论形态又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不可缺失的理论指引和动力资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文化机制

文化是一个民族内在文明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民族性格、审美情感和人文精神的表达,也是对社会实践的价值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成的文化土壤,从共时性维度来看,既包括“内源性”的中国优秀文化,又包括“外源性”的域外先进文化;从历时性维度来看,既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又包括伴生着实践凝练出来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根植中国优秀文化,吸收外来——借鉴域外先进文化,面向未来——融合中外文化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文化机制。

(一)文化机制的内在根植

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反复强调“文化自信”,充分肯定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基础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主要基于“文化自信”,即在内外文化基因中主要基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内部基因。首先,理论体系创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和“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修齐治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天为则”“天人合一”等人文观念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文根脉。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其次,理论体系创新根植于中国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厚植于蕴涵着鲜明表征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理想信念追求的中国革命文化。建党前后至改革开放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形成了红船、长征、抗战、延安、“两弹一星”等传统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革命文化话语主导范式逐渐实现了由革命向建设与改革的转变,呈现出抗洪救灾、抗击非典、载人航天、奥运世博等与强国梦、复兴梦密切相关的新型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成为新阶段、新时期、新时代引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两个重要部分。就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化而言,中国革命文化就是一种“红色精神生产力”,其主要精神动能在于引领道路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坚定理想信念。再次,理论体系创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民族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核心是改革创新)同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诠释着中国精神的核心要义与精髓,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精神标识。

(二)文化机制的外在借鉴

汲取和借鉴域外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创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文化问题上抱守的基本态度。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都具有宽广的世界文化眼光,都一脉相承地主张汲取和借鉴域外先进文化。早在1992年初,邓小平就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⑤在对待域外先进文化问题上,虽然用词略有差别,如邓小平和江泽民用“文明成果”、胡锦涛用“有益成果”,但其基本意涵是一

致的,均主张对其汲取和借鉴。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根植性的同时,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文化的借鉴性问题。他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⑥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强国梦与复兴梦、解决人类共同挑战,就“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⑦坚持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博采各国文明之长,不仅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生长点。在域外先进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是最为突出的代表。它不仅是一种科学理论,而且是一种文化样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思考、回应治国理政党治军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和实境中的新发展,使其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中国话语、中国逻辑、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作派和中国精神。

(三)文化机制的内外融合

关于文化融合,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优秀文化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等域外先进文化元素,用马克思主义等域外先进文化创新中国优秀文化,使其具有国际视野、彰显国际面貌;二是马克思主义等域外先进文化中融入中国优秀文化元素,用中国优秀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等域外先进文化,使其带有中国特色、呈现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合中国优秀文化与包括作为文化样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域外先进文化,在结构上体现了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主、以域外先进文化为辅,在功能上体现了以中国优秀文化为体、以域外先进文化为用。中外优秀或先进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和优劣之别,但理论创新是在中国的宏大背景和时代底色中进行的,因而除产业文化、科技文化、创新文化等领域外,其他各文化领域均应坚持以我为主、以我为体。无论是主辅,还是体用,中国优秀文化和域外先进文化的深度融合、高度会通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实践机制

理论源泉具有多样性特征,即理论既可来源于实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理论、感悟和思想体系。但实践是理论的终极性源泉,一切理论都受到实践的制约与支撑,都是在直接或间接的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与此同时,理论一旦生成,又不能“悬置”于虚空中,必须回归实践、指导实践。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经验总结的双重批判和理论的功能指向三重实践考

量注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实践机制。

(一) 实践机制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革命性等多重特征,但实践是其毫无争议的本质特征。正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发现问题、透析本质、汲取力量、总结规律,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着力点和本质特征,就是展现为社会生活样态的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提出改造或建设新世界的方案。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局,也是其理论体系创新的实践根基的肇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催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四个理论成果。这四个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与把握的结果。它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回答了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探索性、试验性、冒险性、开创性的工作,既缺乏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和依仗,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照搬和模仿。邓小平多次谈到改革开放是“试验”,是书本上所没有的,我们不能奢望马克思在逝世上百年后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摸索,在否定错误和总结成功经验中前进,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创新。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是否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坚持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生长起来的科学理论。概言之,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因素就在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促进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等“十个结合”,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鲜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点和思想支点。正如党的十九大所表述的那样,“新思想”是奠基在新的时代条件 and 实践要求基础上的,是新时代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

(二) 实践机制的双重批判

理论创新源于实践。科学总结和理论提炼实践的历史与当下、国内与国际经验甚至失败教训,是理论创新的一般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总结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正确与错误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创新对实践经验具有依赖性,

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邓小平就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和反思苏联经验标志着党的思想解放与邓小平理论发端的开始。在邓小平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都离不开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汲取。同时,邓小平还意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利用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理论创新时,要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因此,要在实践中取得反对经验主义的良好效果,既要注意中国实践经验的“保质期”,莫用“过期”的经验指导处在“有效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要保持中国实践经验与其他国家借鉴之间的合理张力,在肯定以个体化形态展现的中国实践经验高度契合时代特征、具有各国建设共同属性的同时,充分考量其他国家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等的特殊情况和个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新的理论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化”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另一方面是“化”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形态。因此,总结经验负载着双重功能——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理论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过时的观点、结论、教条式理解的批判,实践批判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失误、挫折与教训的批判。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创新,就要善于总结经验、提升经验,充分发挥经验总结的双重批判功能。

(三)实践机制的功能指向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可以分解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发展,二是社会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终极价值目标上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呼应的,其理论价值明确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因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新不是止步于理论本身,而是要重新回到实践,指导新的实践,推动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内在地嵌入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结构,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归于实践。根据党的十九大做出的战略安排,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定位于2035年,并将在2050年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路中,中国已经选择、正在并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从而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语境结合起来。无论从时空维度,还是从社会主义固有的内在规定性维度衡量,作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以下属性: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战略目标,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和社

会治理为重要手段,以祖国统一为基本前提,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根本保证等。

【参考文献】

-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48.
-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
- ③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 ④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⑥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262.

分类评价:我国高校不同层次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差距探究

胡晓丽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然而,近几年,我国高校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既顺理成章又令人困惑,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普通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办学条件、教科研实力、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造成发展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大气候与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所面临的真实小环境形成了阶段性错位。分析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开展分类评价改革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合理思路,以分类评价理念厘清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新分类,由平面评价转向立体评价,同时精准扶持普通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奋力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差距;分类评价;立体化评价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7JDSZK08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胡晓丽,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35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继续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优化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为突破口,推动各类主体切实履行教育职责。^①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担负

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职责。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是党和国家在新常态下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梳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近年的发展可以发现,一方面,目前国内的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下称“重点马院”)、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下称“示范马院”)成立时间早,领先优势明显,他们在新时代大都期望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更上层楼。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非重点、非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下称“普通马院”)成立时间较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在学院学科发展的理念认识上参差不齐,“很多有效举措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②正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的时间毕竟不长,多数学院是在2015年之后才成立的,它们的年龄小、经验少,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自己的短板,而这些短板单靠马克思主义学院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其学院建设的经验积累也需要经过一个长期历练的阶段”。^③这些发展较慢的普通马院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明显落后,甚至存在“拖后腿”现象。

关于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建设的学术研究中,学界倡导关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内涵发展、质的提高。同时,有专家强调学术研究上需要“拓展研究领域,特别是深化阶段史和专题史研究”。^④但目前学术界尚未特别关注数量众多、综合实力薄弱的普通马院如何实现奋力提速和追赶。本文所研究的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评价探究恰好属于上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畴,研究当代历史背景下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载体的特点是什么”以及“载体发挥的作用如何”。^⑤尝试分析差距,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评价改革,进而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协调发展尤其普通马院的加快发展提供一种有益补充。

一、实力悬殊: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的差距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它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⑥然而,考量近年来国内重点马院与普通马院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在教科研实力、办公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实力差距较大。

(一)教科研实力的差距很大

由于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重镇”、有“高地”、有“主力军”,存在类似“马太效

应”的现象,^⑦全国重点马院基本都是全国首批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普遍拥有目前国内最齐全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甚至有的学院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端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各省评选的省级重点或示范马院,实力基础总体而言逊色于全国重点马院,存在“合理梯队”。但是,这些学院成为重点、示范马院后“更上层楼”,随着专项拨款的增加,其教学、科研实力甚至教师收入也随之得以提升,可谓“名利双收”。

全国重点马院的教师有机会参与中央统编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因此他们不仅在驾驭所任教课程的框架结构、逻辑体系、思想理论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能统领全局做好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引领;科研和学科建设上,“不同单位之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差距拉大”“没有学科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必然面临许多瓶颈”。^⑧

各省的重点或示范马院的教师在教学上高屋建瓴,他们不仅能按要求全面把握教材体系,而且能做好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不仅能运用教研成果来提升教学质量,而且能在教学上不断创新。科研和学科建设上,重点、示范马院的教师既能较好做好教学与教学研究,也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还具备良好的问题意识,面向实践与问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但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高校普通马院的教学科研实力仍然比较薄弱。他们普遍没有博士学科点、硕士学科点,甚至没有相关的本科专业,其工作以思政课公共教学为主,其发展状态严重滞后于全国重点马院、省级重点或示范马院。“在目前高校学术生态之下,马克思主义学院除个别重点高校外,其学术实力整体上低于其他学科的二级学院,学术话语权较弱,这在一般本科院校尤其以理工院校更为普遍。”^⑨这些普通马院公开发布的简介信息中很少国家级成果,能获得省部级成果者已属不易。与全国或省级重点、示范马院相比,普通马院前进的道路依然“问题多多”。

(二)办公条件依然差距悬殊

早在2015年全国第一批重点马院评选结果公布之前,就有专家呼吁:“良好的办公条件、优厚的工作待遇、舒适的工作环境等,是让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有职业尊严感、归属感、荣誉感,能体面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干事创业的重要动力源泉”。^⑩现实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办公条件差异巨大。

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要求高校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配备教学设备和基本图书资料以及办公用房、计算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以满足教

学及办公需要。同时,《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7年本)》规定:“原则上教授有独立的教研用房”。上述“标准”是对所有高校的要求。但是,现实情况是,重点马院有比较独立、宽松的办公场所,所在高校能分配一栋楼归马克思主义学院使用,或者在综合办公楼中划拨出一层供马克思主义学院使用,以保证党政办公、教研活动、试卷存放、图书期刊、会议召开等基本办公需求。同时,重点马院的办公经费亦相对充裕。

而数量众多的普通马院,近年来随着从中央到各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办公条件有明显好转,但如果严格对照教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有些马克思主义学院仍然不达标。不少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经费紧张,甚至连中央明文规定的配套经费也不能真正到位。此外,这些普通马院办公用房紧张,很多马院除了书记、院长办公室,只有秘书办公室和会议室各一间,没有教授教研用房,甚至没有教研室活动用房,更遑论单独的党员活动、试卷存放、工会活动等办公用房了。有的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学院采取明显的差别待遇政策,致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甚至连中央三令五申和明文规定的岗位津贴等待遇要求也打了折扣。

(三) 师资建设和社会服务方面仍然差距明显

师资短缺是马克思主义学院亟需改善的共同短板。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2017年本)》,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设置专职教师岗位”。目前,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师生比普遍不达标。但是,在所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全国重点马院凭借比较优越的办公、教科研平台等条件,其师资队伍建设“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中是最强的。其往往有多位教授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一般拥有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或可能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等。同时,社会服务上,全国重点马院的教师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承担起理论的传播与辐射职能,面向其他高校及高校之外的民众做好理论宣传、培训和社会服务工作。

而普通马院是教育丛林法则之下的“弱势”群体,囿于办公条件、教科研平台等约束,其师资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相对薄弱很多。有专家指出,大部分省属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员配置有待进一步改善。^①普通马院引进的博士师资往往年龄偏大,基本只能接盘重点马院招聘剩余的人选。教师队伍的年龄、教学科研实力、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均比较薄弱。长此以往,普通马院的师资队伍建设积贫积弱,难以获得迅速发展,与重点马院的差距比较大。

二、大气候与小环境错位: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差距原因分析

梳理全国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发展,可以发现除了原有基础实力的巨大悬殊,造成发展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大气候与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所面临的真实小环境形成了阶段性错位。这种阶段性错位主要包括各高校落实国家政策的不同实践加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力差距、各地现行的评价方法扩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科研差距、普通马院面临的真实发展空间依旧局促三个方面。

(一)各高校落实国家政策的不同实践加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力差距

中央设立重点马院的初衷是“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工作思路,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整体性”上提高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不仅建设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院,而是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都高质量地建设好。然而,各高校落实国家政策的不同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综合实力差距扩大的阶段性现象。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因各自的学科基础、院校实际、师资队伍、科研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先天差异性,呈现出不平衡的后天发展状况。全国高校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成立于1992年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4年党中央提出实施“马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学院遇到了百年一遇的黄金发展期。2015年7月和9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先后提出“实施重点马院建设工程”,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研究宣传、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⑫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建设全国重点马院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实施重点马院建设工程,旨在建设一批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学院,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水平。2015年底,全国评出9家重点马院。2016年底,全国又评出12家全国重点马院。与此同时,根据教育部要求,各省先后评选了省级的高校重点马院、示范马院。^⑬2019年8月,全国第三批重点马院诞生,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16家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

各高校贯彻国家政策的不同力度加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力差距。一方面,很多高校在重点马院或示范马院申报和建设的过程中,在专项资金、办公用房、师资培训、教科研奖励等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重点、示范马院的入选有赖于自身既有的综合实力;入选了全国重点马院以及各省重点马院或示范马院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获得的诸种经

费资助从上百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不可避免进一步拉大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间的差距,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另一方面,不少普通马院所在高校在重点马院或示范马院遴选中,没有给予真正重视。这些普通马院很多都是2011年以后才独立设置,甚至2016年以后才成立的。其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换了一个名称或牌子,整体实力没有明显改观或进步。这些普通马院由于实力不济没能入选,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二)各地现行的评价方法扩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科研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高校获得了蓬勃发展。从2012年的100家,已经发展到2018年的834家。然而,各地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评价方法,总体来说仍然停留在“一刀切”状态,以科研、教学、学科发展以及学位点为评价客体。

值得注意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蓬勃发展及其分层非常相似,我国高校经历了规模急速扩大过程中出现体系分化并进行了评价体制的改革。我国高校的评价体系经历了从多元评价(以科研、教学、学科发展以及学位点为评价客体)到分类评价(依据高校的组织职能分为研究型、就业型等不同类型)的转变。目前,高校分类评价理念已成为国内业界的共识:不再一套指标排尽天下高校,而是对不同类型院校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评价其有效性水平。

以现行评价方法为维度进行衡量可以发现,我国高校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遵循着丛林法则,教科研实力强大者获得“重点马院”“示范马院”的标签,这种标签继而带来更多资源和扶持政策。这对重点马院、示范马院有利,而对相对落后的普通马院不利,进而导致差距扩大。首先,这种评价方法带给“重点”“示范”马院每年几十万到上百万的经费扶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强者弥强、弱者仍弱的现象。其次,现行的评价方法使“重点马院”“示范马院”的知名度、学科影响力、平台发展前景等处于明显优势,在师资建设上成为优质队伍资源的聚集地,吸纳了大批国内甚至国际名校毕业的博士;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普通马院则处于劣势,不利于学院长远发展。再次,这种评价方法加剧了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科研产出差异,形成了重点马院“突飞猛进”与普通马院依然“积贫积弱”的鲜明对比。一方面,近几年“重点”“示范”马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取得长足发展的喜人成绩,成为全国或各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地;另一方面,很多普通马院,其工作重心仍然主要局限于教学,其科研呈现典型的单打独斗的“职称科研”特点,其教师的教科研活动主要以

评职称为动力,缺乏可持续发展,其教科研数据逊色很多。

(三)普通马院面临的真实发展空间依旧局促

总体而言,由于中央高度重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整体发展环境有很大进步,但很多普通马院面临的真实发展空间仍然比较局促。中央的总体部署是通过先设置、发展重点马院,然后经过示范引领带动从而促进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整体发展。然而,在国家政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不少普通马院存在有心发展但资源受限或消极等待上级扶持等问题,发展空间依然局促,发展缓慢。

一方面,各地各高校对思政课的重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有些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受限。例如,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实施意见》,每年给予2亿财政资金支持。这就出现了京津二市的思政课教师按月人均2000元全覆盖增发岗位津贴,但是也有些高校不仅没有岗位津贴,甚至存在学分学时或实践教学课时费都无法落实等现象。很多普通马院所在高校,内部早期在各类资源的配置中对思政课机构的重视和投入都不够充分。有些高校出于主干专业发展的需要,往往违反国家政策规定,变相削减思政课学分和学时;生均40元专项经费不足额到位;实践教学“纸上谈兵”;思政课教师的收入在全校垫底。这些情况在省属理工科院校、省属行业院校和财政实力较为薄弱的高校中较为明显。“不少行业特色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定位不够清晰、规模小、资源缺乏,学科建设层次较低,基本处于各自学校边缘化位置”。^⑩这些马克思主义学院很多在消极等待上级的扶持、督导和指导。

另一方面,很多普通马院面临发展的客观瓶颈,想发展但有心无力。近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文件和政策的出台,加大了对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突显其重要性。然而,很多普通马院的思政课教师仍然面临政治地位、政策地位与实际受尊重程度之间的偏离。有些普通马院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采用何种方法和路径实现目标、如何完善学院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如何完成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期待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很多普通马院在顺理成章的分层与较大的现实差距中充满困惑,想奋起直追又深感能力、动力、保障力不足。这些普通马院感知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其所处的真实小环境使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难以盲目乐观。

三、解决理路:分类评价的改革构想

我国高校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均承担着同样重要的育人使命。如何变“阶段性错位”为“各就各位”,是目前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基于现实和形势探索我国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评价方法改革的可行路径,是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泰勒(Terry Taylor)等人提出的增值评价法,以及我国高校评价变迁的历程和分类评价改革尝试,可以为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评价方法改革提供颇有裨益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一)树立分类评价理念,厘清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新分类

1985年,泰勒(Terry Taylor)等人提出的增值评价法,旨在关注教学、教育的提升增量;前述高校评价方法改革,根据其组织职能分为研究型、就业型等不同类型高校。作为借鉴,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可以在确认分类的基础上,进而明确分类的评价内容,聚焦其评价指标的增长提升。曾有学者指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思政课教研室基础上形成的学院,这类“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政课,可以称为教学型学院;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既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政课,又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以及邻近学科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这类学院可以称为教学科研型学院。^⑤笔者认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也可以分为全国重点马院、各省示范马院、普通马院三类,其中重点马院、示范马院大多属于教学科研型学院,而普通马院大多属于教学型学院。

在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确认新的分类归属后,继而公布分类评价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对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分别评价,不再进行“一刀切”评价,以实现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特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新分类将遵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分层现状,同时更加注重各自评价指标的增量提升。对于数量众多的普通马院来说,它们多来自地方普通应用型本科高校,其学科基础、院校实际、师资队伍、科研能力等方面呈现出发展很不充分的特点,但是其对人才培养和地方就业的贡献是巨大的。目前,他们局限于简单地在组织形式上模仿重点马院,其实重点马院的深厚底蕴、教科研实力等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浅层模仿达到,他们亟需内涵式发展以实现办学质量的根本提升。^⑥它们需要上级帮扶和政策引领才能迅速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各类政策杠杆才能推动小环境的优化,从而充分提升其教学、教研乃至育人的特色潜力。

（二）实施分类评价改革，由平面化评价转向立体化评价

截至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评价的关键词均集中于教学、科研、学科、社会服务等。这种平面化的评价方法不可避免存在两大核心缺陷——评价指标对社会情境的抽离性和碎片化特征。^⑩脱离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际情况同时碎片化评估其教学、科研、学科发展及学位点建设，必然增大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间本就存在的差距。要实现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协调发展，必须进行分类评价改革，由平面化评价转向立体化评价，激发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挖掘自身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从国家“重点”、各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遴选到《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标准》的发布，官方评价具有权威性，其评价结果可以直接影响政府的教育资源分配、引导高校的发展方向，其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力使各马克思主义学院认真对标对表。因此，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分类评价改革应当亦以官方评价改革为主。

新的分类评价改革的实施应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客观实力差距，对不同类型的马克思学院分别制定其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评价指标及不同权重。在制定评价指标时，除了一般性指标，根据不同类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工作侧重、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提炼各自的关键性指标。教学科研型马院的关键性指标聚焦教学、科研、学科和学位点；而教学型马院的关键性指标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强化大学生道德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的培养，既为地方就业提供强力支持又完成了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

（三）开展“精准扶贫”，助推普通马院奋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思政课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涉及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育人使命上马克思主义学院不分层次，全国所有马克思主义学院都承担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光荣职责。因此，不仅要大力推进重点、示范马院建设，也要千方百计尽力加快非重点非示范的普通马院发展。

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分类评价应加强对普通马院的“精准扶贫”。根据普通马院的类型特点，适当降低其科研指标同时增加教育、教学、服务社会的要求，鼓励其创新人才培养的特色改革，充分调动其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以扬长避短；对“重点”“示范”马院的评价指标除了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亦应包括示范引领作用的实际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评价新体系将有效解决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近年来实力差距扩大的趋势，指导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新的分类评价中找准新定位、新目标、新路径，形成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并各自取得最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四、结 语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举措,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其特殊性的认识仍存在“不到位”或“模糊”的现象。^⑮ 深入分析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可以发现,近年来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科研实力、办公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差距整体来说没有缩小,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重点马院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已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发挥了积极带动作用。但是,全国有 2500 多所普通高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研及服务能力相对欠缺和薄弱。^⑯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评价方法亟需改革,对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采取分类评价,通过科学的政策引导不同层次马克思主义学院既获得科学、快速、充分发展,又同时实现从“先富”到“共富”的转变,从而推动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大战略的贯彻落实。囿于研究视角的局限,本文侧重于站在普通马院的视角探究不同层次马院的发展差距及外部评价方法,并未深入挖掘不同层次马院内部的师资、管理等影响因素,亦未全面梳理全国重点马院、省级示范马院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重点马院在新时代面临新的重大使命。这些都有待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开展。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30/c_1124943080.htm,2019-08-30.
- ② 马福运,潘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出路[J].思想教育研究,2016(4):74-77+127.
- ③ 陈占安.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在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9):4-8.
- ④ 王树荫,韩华,温静.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进展[J].思想教育研究,2014(8):6-18.
- ⑤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视域拓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45-51.
- ⑥ 陈占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由来和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0):4-7+14.
- ⑦ 王永斌,康淑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影响力分析——以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为中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1):74-84.

- ⑧ 忻平,吴德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208-210.
- ⑨ 曹峰旗.从外延转向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1):97-103+108.
- ⑩ 白显良.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几个关键词[J].思想理论教育,2015(6):30-34.
- ⑪ 崔燕.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8(7):84-87.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具影响力的40件大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1):61-75.
- ⑬ 张荣军,欧阳恩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153-155.
- ⑭ 彭庆红.关于行业特色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5(1):21-22.
- ⑮ 郝立新.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5(3):25-28.
- ⑯ 葛笑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同形性分析[J].江苏高教,2017(1):52-55.
- ⑰ 罗燕.中国高校评价的制度分析—兼论“双一流”建设高校评价[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6):37-44.
- ⑱ 苏煜,李建华.厘清与强化: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定位、功能及相关问题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8(11):115-119.
- ⑲ 燕连福.新时代全国重点马院建设面临的问题、机遇与发展对策[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1):96-103.

课程思政视域下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契机、转变与进路

张 进 刘广乐

【摘要】 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必然要求。“课程思政”是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的一种育人方法。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覆盖面将得到进一步拓展、牵引力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契合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实效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教育的目的、主体、方式、载体和评价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因此,要有效协同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实践类课程和家庭教育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让爱国主义在当代大学生心中深深扎根,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 课程思政;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基金项目】 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新农科和新工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时代农林高校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xnk2020025)。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张进,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处讲师;刘广乐,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处副教授(武汉 43007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①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

战略高度,就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做到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矢志推进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课程思政是在“三全育人”理念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门课程,以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一种教育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②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塑造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大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文明建设工程,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④教育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为高校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转变和进路,以此为循,各门课程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思政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中,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

一、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契机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政治、历史、哲学等相关课程的学习,主要以灌输式的方式,通过显性教育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塑造,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单兵作战”,没有与其他思政资源形成合力,致使出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力量单薄、形式单一、平台有限等问题,在灌输性多于启发性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教育入耳、入脑、入心、入行程度不够。随着信息时代的深入发展,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获取信息的技能、渠道和速度已然不同于以往,爱国主义教育的

内容和形式也必须与时俱进。课程思政建设对于持续深入开展好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在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集团作战”,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让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提质增效。

(一)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覆盖面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同时,“在普通高校将爱国主义教育 with 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课程有机结合,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比重”。^⑤因此,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在切实发挥好课堂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还要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在“门门课里有思政”的背景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覆盖面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不断深化,每门课程都将也必须承担起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做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在课程知识讲授中有机融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内容,不断激发大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让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学生心灵深处扎根,引导大学生主动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伟大实践中去。另一方面提高了教育频次,每门课程都肩负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就能够为大学生开辟除在思政课之外继续受教育的路径,也能够与“第二课堂”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同频共振,形成合力。

(二)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牵引力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实施,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不断被挖掘,并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载体展现在学生面前,实现了既理直气壮地讲爱国主义,也进一步推进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和信息传递上的润物细无声。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生成的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牵引力将得到进一步强化。高校人才培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育才和育人相统一,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的核心就是要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家国情感,教育引导学生在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不断提高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努力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⑥课程思政视域下各门课程要深入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元素,砥砺大学生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中华民族历来是有爱国传统的民族,在漫长的实践中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优良传统,要在课程知识讲授中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树立为中华复兴而读书的远大理想。^⑦

(三)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契合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必须突出教育的群众性。”对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而言,课程思政建设贯穿着“三全育人”和“人人时时处处皆育人”理念,即调动和汇聚可用的育人资源,形成思政育人大体系。围绕课程思政建设而不断完善的爱国主义教育大体系包含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⑧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成长环境的深刻影响。家是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国是个人成长的大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⑨这就要求教师既为经师亦为人师,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契合度,在课程知识讲授中教育引导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练就过硬本领,矢志创新创造,培养奋斗精神,在新时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显性教育又是隐性教育,需要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寻求育人能量,让学生从历史中生发出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认可和坚定自信,从而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同时,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还必须注重用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鲜活素材,提升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情感。课程思政建设的大力推进将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提供重要的支撑,专业教育课程中的前沿知识、最新研究,公共基础课程中的道德实践、价值塑造,实践类课程中的社会调研、创新创造都能挖掘出爱国主义元素。如中国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上所取得的战略性胜利,在实践中形成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为经济学、医学等专业课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提供了鲜活素材,用具体可感的事实生动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转变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在任务和目标上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在思政内容、课程地位、课程特点和思政优势等方面却根本不同。^⑩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所有课程都具有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功能,承载着塑造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职能。但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政”,也不是在其它课程讲授时用几节课讲授思政内容。课程思政需要教师在传授学科知识的过程中,主动挖掘学科课程内在的思政资源,以完成品德的塑造与人格的发展。^⑪为此,其教育目的、教育主体、教育方式、教育载体、教育评价都将发生转变。

(一)教育目的须从知识讲授向价值塑造转变

思政课程注重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教育,让学生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强调学生要学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理解爱国主义内涵与实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不断深入,将思政工作体系贯通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构建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高度共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都为高校做好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高校要充分发挥好专业课教师“主力军”、专业课教学“主战场”、专业课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实现专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将科学精神、专业伦理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各门课程知识,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和塑造;强调在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巧妙地融入思政及爱国主义教育元素,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成长为全面发展的“参天大树”。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人民战争、总体战就是十分鲜活的思政素材,除了面向学生把战“疫”故事讲好之外,还要通过课程思政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背后彰显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引导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断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二)教育主体须从思政教师向全体教师转变

教师是课程思政生成的关键因素,^⑫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者、实践者、推动者。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的核心力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不仅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其中最核心的是要传爱国主义的大道,尤其是要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通过生动鲜活的方式引导使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广大学生群体中落地生根。同时,要引导学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认真真学习,扎扎实实做事,做到“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把学习创新理论的成果转化为爱国报国的实际行动。课程思政要求全体教师在讲授课程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样的人,切实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塑造能力。为此,必须提升全体教师的思政理论水平,不仅要强化培训,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政策解读,让全体教师明白课程思政建设“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问题,还要将全体教师纳入思政教育培养培训计划,畅通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之间的转变渠道,赋予专业课教师讲好、讲活、讲懂思政故事的能力。其根本目的在于转变专任教师观念,挖掘好每一门专业课的“德育元素”,^⑬实现“思政”与专业的“基因式”融合。^⑭

(三)教育方式须从被动吸收向主动感知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这表明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有一定的外在强制性。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缺乏相应的手段和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灌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动接受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内化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也主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被动吸收形成。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推进,专业教育需要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能够通过授课老师对专业课程中真善美资源的深入挖掘,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专业知识一道进入学生脑、进入学生心,从而让爱国主义教育自然发生,理解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逻辑。为此,每位专业教师必须增强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革新授课方式,借助现代教育技术,通过MOOC、翻转课堂、小班教学、雨课堂等多种课堂形式,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将爱国主义教育等思政元素巧妙地嵌入课程知识,增强课堂的吸引力和趣味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四)教育载体须从单一宏观向多元具体转变

一直以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理论讲授、实践活动等形式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思政要求每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还要讲清楚该门课程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促进学科进步的关键人物,以及课程所彰显的核心价

值,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课程思政使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由单一的思想政理论课转变为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变得具体而生动。必须全面改革课程体系,从课程开设目标、课程组织形式、课程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建设之中,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系统梳理和改造,深入挖掘各门课程蕴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着力构建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体系。^⑮与此同时,课程思政建设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时要搭建更为丰富的实践锻炼载体,如充分利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又如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涵育功能,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课程思政建设推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载体转向多元具体还需要高校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效融合,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为学生涵养爱国主义情感提供支持。

(五)教育评价须从短期导向向长期观察转变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洗礼、精神的熏陶。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坚持虚功实做、久久为功,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在具象化、细微处下功夫,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⑯在一定时期内,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相对单一,主要以思政课程为主要渠道,以灌输为主要方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评价多注重短期的热度甚至通过考试分数进行考量。长远来看,短期导向为主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评价有急功近利之嫌,部分课程尤其是思政课程以分数评价教育效果,造成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时热时冷的情况。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为我们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评价体系尤其是注重长期观察视域下的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切入口。课程思政建设是需要贯穿在教学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等教育教学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大任务。课程思政建设的长期性从一个层面决定了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评价需要长期观察,即需要建立起跟踪评价机制,不仅在校内有评价,还要在学生毕业走出校门后进行跟踪观察。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进路

课程思政视域下,根据课程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可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育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每类课程因课程内容和讲授方式不同,在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不同,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一)持续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立根铸魂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个人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按照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给学生种下真善美的种子;坚持“八个相统一”的要求,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模式改革,纵向上加强与中小学和研究生思政课衔接,横向上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引导学生理清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持爱党和爱国、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①7}

(二)深入挖掘专业教育课程的同频共振作用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专业素质养成和价值取向成型的关键阶段,专业教育中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密不可分。专业教育课程是学生学习的骨干课程,重在知识传授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鼓励教学名师到思政课堂上讲课。”^{①8}任何一门专业教育课程都是在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密切相关,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专业课教师应自觉强化课程教学的育人意识,牢固树立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理念,切实“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课程要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比重,使之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引导学生科学认识,中国处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珍视机遇、直面挑战、勇于担当、行稳致远。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要重点加强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科技强国、科学报国的思想,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使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广泛激活公共基础课程的文化浸润作用

公共基础课程是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兴趣爱好的课程,是追求人文与科学、语言与艺术均衡发展的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成为适应社会需要、健康、全

面发展的人。公共基础课程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其教学目标重在“育人”,而不仅仅是“教书”,这与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异曲同工。新时代,公共基础课程成为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丰富和优化课程资源的有效载体,要进一步扩充公共基础课程的类型和数量,整体提升课程质量,开发体现爱国主义要求的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作品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厚植爱国主义的文化根基。

(四)有效调动实践类课程的求真力行作用

实践类课程是基于学生已有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获得真实体验,在此基础上有所知、有所悟、有所得。爱国不是空洞的情感表达,而是具体到一言一行的实际行动。爱国主义教育终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报国之行。首先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抱负。周恩来在12岁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新时代的大学生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理应树立“为中华复兴而读书”的宏伟目标,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其次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要统筹课内和课外、校内和校外的实践资源,审视实践课程的育人目标,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其中,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让学生在专业实验、课程实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中感知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学生将个人“小我”融入到祖国“大我”之中,在实践中坚定报国志向、练就过硬本领。最后要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氛围。要利用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日开展“同升国旗、同唱国歌”“青春告白祖国”等活动,引导学生真挚表达爱国情感。要深入挖掘校史校训校歌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引导学生创作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作品,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宣传,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氛围,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五)持续强化家庭教育的涵养导行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①9} 家庭对于做好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断推动课程思政建设除了要重视从思政课程、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实践类课程等方面发力外,还需要牢牢把握住家庭教育这一关键要素。要重视发挥家庭、家长作用,构建家长、学校、学生共同体,让家校联合的育人合力成为做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力量。要重视传承和弘扬优秀的家教、家风在滋养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意识,让好的家教、家风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②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③⑩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9-11(1).
-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 ⑤⑬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1-13(6).
- ⑦ 魏勃,李治勇.凝心铸魂推进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06):45-47.
- ⑧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5-25(2).
- ⑨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 ⑩ 石书臣.正确把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18(11):57-61.
- ⑪ 许瑞芳.一体化视角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四个维度[J].中国高等教育,2020(8):6-8.
- ⑫ 邱伟光.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17(07):10-14.
- ⑬ 吴月齐.试论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的三个着力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01):67-69.
- ⑭ 成桂英.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三个着力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09):67-70.
- ⑮ 刘承功.高校深入推进“课程思政”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8(06):62-67.
- ⑰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2).
- ⑱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重大疫情背景下运用人工智能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孙 强

【摘要】重大疫情之下运用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国家需求,也能发挥其独特优势。本次疫情中人工智能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提高了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及速度,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直观性,增强了思政工作者的宣传效率,促进了辅助心理咨询、在线思想政治教育及虚假信息甄别等工作的开展。通过这些应用带来的反思包括:AI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蕴含广阔空间,也对思政工作带来了挑战,AI运用于思政工作需要有效制度规范,AI无法取代思政工作者的地位。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重大疫情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中的‘人权’研究”(19YJC710062);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研究”(18JD71007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孙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14)。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中国带来重大考验。在这场全民战“疫”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的应急处置手段之一。基于疫情本身具备传染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不少挑战,而人工智能(简称“AI”)在抗击疫情期间除了对疾病救治、人员安置、物资运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也有效辅助了思政工作的开展。这种“AI+思政”在重大疫情中的具体应用对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带来了很多启示,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

论述。

一、重大疫情中运用 AI 推动思政教育的背景

重大疫情之下,将 AI 用于思政工作既契合了国家相关要求,也便于利用 AI 自身优势在疫情期间辅助思政工作的高效能开展,是科技对思政工作带来的重大契机。

(一)契合国家要求

对重大疫情中的思政工作国家有明确要求,重大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立法中明确提出要在事件处置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40 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街道、乡镇、居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居民、村民宣传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传染病防治法》也明确提出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公益宣传,各级各类学校要进行预防应急教育。同时重大疫情也属于突发事件范畴,我国专门规制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法律《突发事件应对法》,其中第 55 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思政工作是重大疫情应对中的必要环节。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央也对抗“疫”期间的思政工作做出明确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提出“要深入宣传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多层次、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①然而疫情的严重性给思政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AI 恰好可以发挥其在疫情期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推动作用。

对 AI 辅助疫情应对国家有明确政策导向,在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构建公共安全智能化监测预警与控制体系。”^②2018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③由此可见,将 AI 用于重大疫情应对、服务公共安全是国家发展 AI 的重要目标导向之一。针对此次疫情,习近平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④为迅速贯彻落实中央精

神,工信部在2月19日部署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提出“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疫情监测分析、人员流动和社区管理等。”^⑤所以面对本次重大疫情,国家迫切需要人工智能与思政工作实现有效结合,辅助中央抗击疫情具体工作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对此大批人工智能企业迅速进行产品研发、改造并尽快将产品投入抗“疫”中的思政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AI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优势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⑥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此次重大疫情的高传染性要求尽量减少人员接触,由于工作方式受限、工作量大,思政工作者难以做到对工作对象有全面充分的了解。如基层的居委会,每位工作人员可能要负责成百上千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深层次地去了解每个人的状况显然难以做到,只能重点关注存在问题的个别人员,面对大部分人做统一化管理。这就决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面对面沟通、根据对方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宣传的优势难以发挥,在困境中人工智能技术对思政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人工智能是对人脑智慧的模拟,以大数据、算法和深度学习为技术基础。有学者总结,近年来人工智能热潮的爆发关键在于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让深度学习大显神威。^⑦AI 运用于思政工作主要有两大优势,可概括为对“人”与对“物”两方面。一是对“人”,即对人的行为状态、思想变化做出分析研判。其作用过程表现为 AI 将人的多元思想、自身行为转化为算法所处理的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做算法分析,用大数据的方式来解读人的思想,进而达到对人的思想动态做出刻画的目的。只要人的思想、行为会留下数据痕迹,AI 就会捕捉到人的思想痕迹,虽然未必能完全还原,但还是可以作为理解人的思想的一种辅助。只要数据量足够大,信息反馈及时,AI 所能发挥的智能程度就更高,我们就能掌握特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AI 正是通过广泛搜集人员信息,通过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及逻辑思维能力,实现对人的综合分析。二是对“物”,即 AI 可对各种信息快速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能有效生成并精准推送思政工作信息,达到对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宣传的高效化,实现主导思想的宣传引领,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仍旧是大数据分析。这两大优势都建立在 AI 对大数据的强大分析处理能力之上,而“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⑧伴随互联网、手机、自媒体的普及,每个普通群众都成为

生产信息的力量,人的各种信息、社会各种事件都变为数据被收集分析,借助 AI 的分析研判思政工作者能快速捕捉社会及个人的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的,减少了搜索信息、发现问题的时间,能够有精力重点针对问题对象制定个性化方案,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需要有效沟通、需要具备创新创造能力而 AI 又无法胜任的工作中。这些优势决定了 AI 对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二、此次疫情中 AI 应用于思政教育的分析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思政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的讲话中也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⑨结合中央要求,大量 AI 产品被运用到思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提高信息发布的速度及准确性

重大疫情面前思政工作首先要做到效率性原则,要求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准确收集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研判,抓住控制态势的有利时机,及时做出信息发布,对处于关键时刻的民众进行激励、鼓舞。借助 AI 可以将搜索、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加工后发布,信息处理速度远超人类,为赢得有利舆论环境创造了时机。比如瑞莱智慧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在疫情期间推出了“新冠肺炎疫情 AI 话题分析平台”,该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 with AI 建模,识别热点话题并进行新闻追踪、话题导向分析,为用户第一时间推送全网最新动态。^⑩该应用也为政府部门掌握舆情实时动态,进行正确舆论引导提供了分析依据。

AI 发布信息的准确性也有保障。AI 机器人会严格遵循程序代码设计的规则,基于其主动学习模式,通过地理区域、关键字等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流自动抓取与标记、分析潜在疫情信息。通过对巨量媒体信息分类,为政府、民众提供准确的疫情信息,进而提高疫情应对意识与能力。AI 以数据库、信息流为依托所实施的精准分析,避开了人为因素对数据的污染,尤其对突发疫情中个人可能存在的主观偏见等问题可有效缓解。同时重大疫情中大量复杂数据及专有名词会对个人知识储备带来极大挑战,而 AI 则利用数据库中海量信息进行加工成稿,增强了信息的准确性及可读性。此次疫情期间这方面的应用很多,如腾讯云就构建了数据共享和统一标准的数据治理体系政务云平台,推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的“新

型肺炎疫情防控专题”迅速上线,提供关于疫情预防、实时动态、自查等一系列精准信息服务,方便疫情信息的准确获取。^①

(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直观性

对于重大疫情,以往的有图有真相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随着社交网络步入短视频时代,视频的强烈纪实感更能把突发事件客观还原给用户,现在很多关注度高的报道往往都有原创视频的呈现。但视频制作既耗时又繁琐,存在技术障碍。而很多 AI 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对视频的制作需求,比如此次疫情期间使用的一键转视频机器人,依托智媒体的全系统解决方案,将 AI 技术和媒体实现有机、深度融合,可以快速将 word 格式的图文稿转为视频,大大提高了宣传内容的吸引力,也让视频快速量产成为可能。^②当然目前 AI 机器人所制作的视频相对还比较粗糙,需要后续调整、优化,但这是对思政工作的一种有效提升。

(三)增强思政工作者的宣传效率

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思政工作者面临众多宣传任务,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开展重大疫情基础知识教育,让民众了解疫情的表现及本质,对疫情形成科学全面的认识。二是普及疫情应对知识,传播应对疫情的基本知识与技巧,培养人们自我救助与互助的能力。三是宣传疫情应对的政策、法律规范,此次出台了很多疫情应对的政策,我国也有明确的疫情应对法律法规,政策法规教育可以让人了解疫情处置的基本要求,避免因自身行为不当违背政策、触碰法律底线。这次疫情的特点决定思政工作者的这些宣传任务很难有效落实,所以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各地主动运用 AI 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宣传,“无人机+小喇叭”成为当红模式,通过“空中+地面+网络”立体宣传手段扩大了宣传范围,提升了效率,节省了人力。疫情期间推出的很多智能问答机器人也可对询问者提供相关政策、法律及知识咨询,并能将对话信息自动归档整理生成数据报告供管理者参考。而且针对广大乡镇地区人力有限、普通话不标准等问题,AI 机器人可以实现文字转语音快速、清晰播报,避免人与人之间过多接触,也有效增强了宣传效率。^③

(四)辅助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是思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疫情期间人们心理波动更为剧烈,心理创伤更加严重,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急障碍。心理咨询能够提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但疫情期间心理咨询需求巨大,有限的人力资源无法满足大量的需求。AI 可以辅助心理咨询,其优势在于能快速积累与复制心理咨询经验。^④对于人类咨询师而言,个人

的经验、技能难以直接传递给同行,而 AI 可以无限制复制、传播人类经验。这一特点决定在重大疫情暴发后 AI 咨询系统可实现迅疾响应,快速复制重大疫情的心理疏导经验。正如 AlphaGo 可以学习上百万的棋局, AI 也可通过学习平台上的新案例实现不断升级、快速成长,满足社会需求,大幅度降低了咨询成本。并且 AI 结合大数据分析还能精确预测、诊断咨询者的行为倾向。基于这些优势 AI 基本能做到在常规问题处理上达到优秀心理咨询师的水平,当然 AI 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咨询师,只是人完成工作的辅助手段。此次疫情期间阿里巴巴达摩院、百度、搜狗等公司推出了 AI 智能客服机器人,能够智能处理各种咨询来电,还设置疫情心理慰问师等在线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基本心理咨询。^⑮ 深思考、同花顺、京东等公司通过多模态情感计算、多轮上下文对话、多模态深度语义理解等技术研发出“AI 疫情防控及健康咨询机器人”,能在情感心理上抚慰咨询者。^⑯ 疫情期间 AI 对心理咨询工作的辅助对思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多有益帮助。

(五) 辅助在线思想政治教育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可用在线教育来替代常规教育模式,思政工作者变为线上咨询师,借助 AI 技术在线上完成教育任务并及时回复求助。此次疫情中很多 AI 企业为在线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如百度、阿里巴巴等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助力学校网络平台建设,推动教育信息化,赋能各大在线教育平台。^⑰ 华宇公司在抗击疫情期间,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社交式智能应用“我在校园”,学校各层级学工管理者通过该平台可随时随地精准掌握学生动向和近况,方便思政工作的开展。^⑱

(六) 辅助虚假信息甄别

面对重大疫情,很多人为了博眼球、蹭热点而炮制假新闻、图片、视频,给思政工作带来众多负面效果,而 AI 技术可以实现对虚假信息的有效甄别。比如针对疫情期间广大县城及农村地区防疫意识较弱,谣言甄别能力不足等问题,趣头条重点关注县域疫情发展情况,自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在“肺炎疫情实时追踪”专题页中以及“抗肺炎”频道增设辟谣板块,整合权威媒体资源进行辟谣,不定时发布、更新信息,对那些传播范围广、社会危害大的谣言进行重点清理,以正视听。^⑲ 实践证明,辟谣科普类文章转发率高,说明用户看到信息后实现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也说明这类应用可以有效地推动舆论引导,便利了思政工作的开展。

三、重大疫情中运用 AI 推动思政教育的反思

此次重大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思政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对广大思政工作者带来很多启示,本文聚焦于如下几点:

(一)AI 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蕴含广阔空间

首先,从数据利用层面看,这次突发疫情中 AI 的表现充分印证大数据、人工智能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辅助工具,极大提升了思政工作的效果。如果与 2003 年的非典等重大疫情相比,我们更可感受到这种变化。在信息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发生重大疫情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人力,不仅效率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更增加了思政工作者的感染风险,无法有效将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而本次疫情应对中,从最新疫情信息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的求助和认证,从多平台防疫科普直播到普通人的守望相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身影无处不在。因为在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离开数据,在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正是基于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人工智能才能准确把握思想动态、舆情导向,并结合民众需求进行及时有效的思想疏导。而在不远的将来数据威力会更大,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测算,人类最近两年产生的数据相当于之前历史上所有数据量的总和。在 2020 年,人类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 40ZB,“这些海量的数据将彻底颠覆人类的认知。”

^⑩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将带来重大机遇。

其次,从作用场所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在基层,而迫于人力、物力所限,以往我们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难以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对基层大规模人群的思想政治工作覆盖。这次疫情中很多 AI 企业为基层社区提供了大量 AI 产品的公益服务,通过具体实践使很多基层组织、政府单位对 AI 在基层思政工作中的作用发挥有了更为直观、深入的理解,而很多 AI 企业也通过这次疫情找到了 AI 产品广阔的应用场景。尤其对一些标准化、重复性的思政工作,都可以交给 AI 机器人去做,这也是人工智能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所以在将来大型的城市社区、广袤的农村大地都可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二)AI 对思政工作也带来了挑战

一是挑战思政工作者的中心地位。在信息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思政工作的开展主要依赖于人与人的信息传递,思政工作者居于中心地位。而进入 AI

时代,信息来源是多渠道的,而且 AI 可以根据用户的特点与喜好对其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了这个巨大数字网络的附庸。”^② 长期如此人反而会处于一种被单一信息蒙蔽的状态。大量的 AI 应用未必都能处于思政工作的监管引领之下,在一个越来越智能化的社会,如何保证思政工作者的宣传引导能够通过 AI 应用有效进入民众视野将是一个重要课题,AI 的发展让思政教育工作者的中心地位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这意味着思政工作者要做出更有说服力的分析,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说理来征服民众,借助 AI 将主流价值观实现有效传递。二是思政工作对象的变化。此次疫情中很多人都会利用各种人工智能应用获取信息,而这绝非疫情期间的特例,随着 AI 与人类生活的深度结合,由此带来了人们对 AI 的过度依赖以及对自我能力的过度忽视,^② 进而导致人们更容易丧失自我思考与判断。因为现代社会工作、生活快节奏化,也使人们的时间碎片化,当人们有思想困惑、知识需求的时候,最快捷的路径是求助 AI。只选择重点、摘要式的 AI 回应方式让学习者在短时间内快速掌握表象知识。答案虽可轻易获取,但思想、知识却不易系统完整得到,同时也带来人的学习、思考能力被弱化,丧失自身的深度、系统思考能力,对科技的过度依赖使人不自觉地受制于科技。而目前依靠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 AI 尚缺乏反思能力,如果大数据出现错误,AI 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比如聊天机器人会学到人类的偏见、脏话,也会把人引向歧途。尤其是当今的青少年学习生活中大量由 AI 产品陪伴,他们更易受到 AI 的影响。AI 对思政工作对象的影响日益加深,为思政工作赢得受众带来了挑战。如何发挥 AI 优势、消除弊端,将 AI 变为思政工作的得力助手需要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三)AI 运用于思政工作需要有效制度规范

这次疫情中 AI 的应用很多,大量的 AI 产品确实对思政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误导性的应用。比如谣言借助 AI 的传递会在抗击疫情的紧急时刻产生比平时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谣言制造者当然应受到制裁,而谣言传递所依托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是否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对 AI 的制度治理是否存在缺失。再如在此次疫情期间为便于疫情控制、思想宣传等需要,对大量人员信息进行了采集,涉及个人基本信息、活动轨迹、身体状况、购物消费等,这些信息经过 AI 的分析会实现对人的精准掌控,这就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如何确保信息搜集遵守隐私边界?如何进行信息的安全存储,防止被泄露?基于疫情特殊性这些问题没有获得优先级的处理,但疫情结束后隐私安全漏洞及其衍生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恰当处理可能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海量、活跃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为 AI 提供了极

为庞大的数据流,但在 AI 核心技术上我们与西方世界仍有不小的差距,如果这些数据信息被国外所掌握并依托其强大技术进行分析,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所以, AI 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遵循制度化、法治化治理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6 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③对人工智能而言,强化制度治理,出台专门的法律规范,防范 AI 被不当利用损害个人权利、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才能让 AI 更好服务思政工作的开展。

(四)AI 无法取代思政工作者的地位

当前的人工智能还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只能根据人们预先设置的程序解决一些特定领域的、确定化的问题,还不能胜任人所从事的所有工作,无法取代思政工作者的地位。这一判断也是建立在此次疫情中 AI 的实际应用基础上的,具体理由包括: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引导,需要通过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有效沟通对话来解决,这一过程蕴含着复杂性及诸多不确定性。对人的行为、思想的解读与疏导应放置于人与人互动交流关系的背景中进行,同一行为、话语可能在不同场合、条件下就有不同的内涵,无法仅仅通过字面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很多时候需要结合个体所处的具体环境、内心状况、性格特征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体现出复杂性。需要倾注思政工作者的情感、理念以及人文情怀,这就要求教育者有高超的教育智慧与技巧,而当前 AI 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二是 AI 虽然采集到大量数据并能对数据做全面分析,但仍旧无法全面反映人们的社会心态、情感变化等,因为人们的思想、意识未必能全部还原为数据与算法,这也就决定 AI 虽获取大量数据但未必能做到全面预判,只能作为对人类分析预判的一种辅助。三是 AI 只能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无法完全洞悉人所独有的社会、心理属性,因为只有人才具备社会生命形态,人的社会现实性是 AI 无法超越的技术瓶颈。^④ AI 所擅长的还是数据支持、技术帮助等,只能起到辅助思政工作的作用。所以,运用 AI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避开唯数据论,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温度。思想政治教育与 AI 要形成有效融合,而不是用 AI 取代人或高度依赖 AI 而减少人的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①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1-6.

- ②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J].重庆与世界,2018(2):5-17.
- ③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10/31/content_5336251.htm,2018-10-31.
- ④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人民日报,2020-02-15(01).
- ⑤ 于大勇.工信部: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N].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20-02-24(1).
- ⑥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
- ⑦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工智能全球格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28,231.
- ⑧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6.
- ⑩ 丁佳.运用人工智能挖掘信息战“疫”价值[N].中国科学报,2020-02-21(3).
- ⑪ 李雪钦.疫情阻击战,AI显身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2-12(8).
- ⑫ 战“疫”,近千家媒体机构是如何在线化生产的[EB/OL].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4/c40606-31600532.html>,2020-02-24.
- ⑬ 大幅提升社区防疫效率出门问问疫情防控机器人全国上岗[EB/OL].http://life.gmw.cn/2020-02/24/content_33586180.htm,2020-02-24.
- ⑭ 蒋柯.人工智能或促进心理咨询业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0-16(7).
- ⑮⑰ 杨靖.硬核技术赋能人工智能企业深入战“疫”前线[N].中国工业报,2020-02-06(1).
- ⑯ ⑱ 抗击疫情人工智能企业在行动 [EB/OL].<http://ai.people.com.cn/GB/n1/2020/0219/c422228-31594719.html>,2020-02-19.
- ⑲ 桂小笋.科技公司争当战“疫”排头兵[N].证券日报,2020-02-19(3).
- ㉑ 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9(3):8-17.
- ㉒ 潘恩荣.人工智能“机器换人”问题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2019(5):93-99.
- ㉓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2-06(1).
- ㉔ 李德顺.人工智能对人的警示[J].东南学术,2018(5):67-74.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 教学实效性研究

王殿文

【摘要】以思政课教材为蓝本,在专题式教学的思路指引下,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改革的路径,既是促进学生全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地生根的有效手段,又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和进头脑的有益尝试。为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实效性,一要充分重视在传统教学中积极融入专题式教学理念的重要意义,二要不断提升教学专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三要注重相关教学案例积累和教学方法改进,四要克服专题式教学本身的不足。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三进;实效性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研究”(项目号:19JDSZK089)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现代道德文化建构与软实力提升研究”(项目号:17A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王殿文,吉林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长春 13011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当前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打破了以往以血缘、地缘等传统因素为主的共同体界限,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化解发展困境的世界视野

出发,以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它既不是“华夏中心论”,也不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自独语,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共同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中国的未来掌握在青年人手中,年轻一代责无旁贷要担负起“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的角色使命。2018年4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大学生思政课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如何完成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地生根,成为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要破解的重要课题。鉴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深刻,本文尝试按照专题式教学思路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改革,做到既源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从而助力增强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同,有效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政治鉴别力。

一、将专题式教学理念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改革的重大意义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②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向学生灌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大而全的常规章节教学在理论灌输方面总显得穿透力不足,将专题式教学理念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改革中无疑是一种创新性尝试。“专题教学是围绕某一特定的疑难问题而展开的有深度的探究性教学活动。”^③传统教学方式通常是按照教材既定章节体系和顺序,按部就班面面俱到地授课,而专题教学往往会超越章节体系和顺序的限制,围绕重点解决问题设置系列专题,将授课着力点集中在对重难点问题的解析、对所涉理论做学术层面的阐释以及对教材作必要的补充。专题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讲授形式单一、内容空泛等状况,借助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层次和研究水平,能够提高授课知识点的广度、深度和延展度,有利于促进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使授课内容更加具象化、鲜活化和体系化,推动学生深化认知、加强认同、提升自觉。专题式教学在“专”“精”“深”等各方面为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将专题式教学理念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中对提升课程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课程教学内容优化整合

列宁说:“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④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单元教学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解决“单”与“多”的匹配失衡问题。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思政课教师的思想单一性要面对学生主体思想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如

何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国际、国内问题,甚至对学生周边复杂的生活环境做出科学阐释。复杂的现实境遇倒逼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必须立足更宏观的视野,借鉴人类发展至今创造出的一切先进教学理念,整合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综合吸取中西方各种教学方法的精华,以确保圆满完成自身使命。将专题式教学理念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教学单元中,首先有助于推动教学内容精深化、体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而课堂教学毕竟时间有限,借助专题式教学便于精准梳理庞杂的知识体系,从中遴选最核心、最重要且与大学生关系最紧密的内容作为讲授重点,然后按照理论逻辑分层次分阶段呈现给学生。其次,有助于突出重点、兼顾全面。专题式教学最大特点既能整合和概括重要知识点,又兼具灵活性特征,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融合到一起,既能保证教学内容有主有辅、轮廓清晰,又能保障整体教学一以贯之、浑然天成。再次,有助于强化逻辑关系、避免重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逻辑主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践行与专题教学灵活结合,既紧扣教学大纲,又有利照应了整体理论脉络的充分呈现。

(二)有利于激发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

邓小平曾经说过,“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当然教与学有相互作用。”^⑤ 教学的本质是“教”与“学”的统一,无论教学手段如何先进,其组织形式都必然要与教师、学生这两个主体发生关联,专题教学同样也不例外。采用专题式教学,首先有利于教师的“教”。以往在讲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教学内容时,每位任课教师通常都要围绕章节要求搜集案例,做一般性备课,一方面分散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又很难保证都能把课讲得深入、透彻、明白。而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之后,问题相对更聚焦,更有益于教师集中精力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领域某方面问题深耕,将相关理论学懂、弄通、悟透,从而指导教学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而且在此过程中也有助于打造优秀的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其次,有利于学生的“学”。当代“00后”大学生普遍主体意识较强,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甚至抱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相对于被动接受理论灌输,他们更渴望通过独立思考、比较和研判来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新视角、新理念和新观点。开展专题式教学刚好契合了新时代大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从广度、高度、深度上都能与之产生共鸣,进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再次,有利于推动师生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以专题的形式开展,当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学生同样可以通过课堂讨论对每个专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与

教师之间质疑与回应的过程同样也是各个专题设计不断完善和重构的过程。科学的理论不畏每一个细节的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借助争鸣收获的不仅是师生教学相长,还有相关理论的日趋完善和强大。

(三)有利于推进理论灌输与解决问题相统一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理论灌输与解决问题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具体运用。信息时代利益多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该为大学生处理现实利益问题提供理论遵循,可现实情况却是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度普遍不高,个别学生甚至还流露出排斥和抵制的情绪,譬如有学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片面理解为“牺牲中国,谄媚世界”,究其原因在于以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过程中重于灌输说教而疏于回应现实问题。为弥补这一缺陷,在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改革之前,首先要围绕某个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展开研究,只有将理论的触角深深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土壤中,授课内容才会引起大学生更好的情感体验。在此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首先要选对“题”,只有带着问题出发,将理论生活化,才会使灌输显得不生硬。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问题通常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代表性,每一个专题设置都有相应的教学任务,各个专题之间表面上看是孤立的碎片,实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条主线如同整个板块的灵魂,使所有分散的专题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对标于实现理论灌输与解决问题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让学生简单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与外延,更重要的是让青年学生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拥有大国公民理应具备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灵魂”,^⑦而且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依据理论指导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

(四)有利于学生深化认知、加强认同、提升自觉

专题式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内涵的专题研究,它的出发点是改变传统教学过程中主题宽泛、内容空洞、结论肤浅等状况,强调“小题大做”。^⑧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首先有利于深化大学生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第一步是依据教材体系和教学大纲廓清整个教学单元的所有知识点,然后围绕这些知识点去收集和凝练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成果,再结合大学生的现实困惑和疑虑确定专题分布和内容设计,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的初心就是为了深化大学生的认知而提供有效供

给,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实施的过程正是检验供给效度的过程。其次,有利于加强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同。所谓认同不但要以认知为基础,还要在逻辑上讲得通,理得顺。因此,有了前面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还要通过历史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实践逻辑等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科学内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大学生从内心深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再次,实施专题教学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理论认知、理论认同的必然归宿,学习、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生活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渐进式掘进策略为有效打通认知——认同——自觉三者之间的进路提供了新的启示,从而有益于助推大学生将所学理论融会贯通、入脑入心,并按照理论指导对周边环境做出正确的行动判断,争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执行者、自觉实践者和积极促进者。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

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改革,专题设计是重中之重。专题式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改革形式,不是教师个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要求设置的每个专题既要体现教学目的,又要注重紧密结合时政热点和学生现实生活环境,总之要精准聚焦问题,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更加有的放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极其广泛,教师要在吃透教学要求和教材内容基础上,谨慎设计教学专题,以满足授课要求。好的专题不仅要考虑授课对象的年龄特点、教学的基本要求、预设目标、基本内容和教学重点,还要遵从导向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现实性原则和保障性原则。

(一)导向性原则

导向性原则重点强调目标性和方向性。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改革之前,一定要先确定改革的方向,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封闭僵化,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按照“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⑨的相关要求全方位谋划布局,用实际行动推动教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学习、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定要站稳中国立场,既非“量中华之物

力,结与国之欢心”,也不是重拾“冷战思维与霸权主义”,而是出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情,以及对时代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因此,培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既是时代诉求,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其次,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整个专题式教学活动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进行。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时,既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二个创造性内容之一的理论现实,^⑩分别处理好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又要紧紧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顺利实现从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再从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转化,这样的专题式教学才能取得实效。再次,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目的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既要帮助思政课教师树立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信心,又要提示思政课教师为应对教学过程中即将面临的困难做好充分准备,不断总结专题教学经验,力争为做好新时代大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二)层次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是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事物的内部结构都具有层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层次性原则是指开展专题设计时以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组织和教育环境的层次性,力争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首先,在教学目标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证学生学懂、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什么,第二阶段要达成青年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第三阶段要让学生能够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去看问题、想办法、做选择,围绕这样的教学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应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专题,并且分别设置不同的教学任务。其次,在教学内容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条分缕析,先讲清理论的外延,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重大意义、实践基础等相关内容,再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包括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五方面内容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然后再立足比较视角,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复次,在教学组织上,应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并结合四门思政课的学科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专题。譬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突出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侧重讲清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历史,并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发展态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

系概论》则要全面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依此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再次,在教学环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应调整教学策略。教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这其中包括全球环境、区域环境、国内环境等,每种环境对于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而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逐步适应、改造和升级,更重要的是制定计划并付诸行动。

(三)现实性原则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⑩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不仅要参照教材、相关文件和理论书籍等本本,更需要结合社会现实和学生认知现状。按照现实性原则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应立足教学目标、知识架构、知识点组合、教学思路等多个点位不断创新教学理念,系统梳理教学理路。首先,在教学目标上要有整体考量。一是确保每一个教学专题既相对独立又葆有一定的顺序和逻辑关系;二是紧扣逻辑主线,避免知识点重复或遗漏;三是设定教学流程与教学方法的考量标准,确保专题教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次,在知识架构上,要前后衔接、系统集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初步探索设置四大板块十二个专题,第一板块理论外延,分别设置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历史意义等专题;第二板块理论内涵,分别设置本质特征、构成要素和相互关系等专题;第三板块理论认同,分别设置认识偏差、意识培树和实践路径等专题;第四板块理论自觉,分别设置文化自信、国际比较和价值超越等专题。复次,在知识点组合上,重点围绕三个维度开展攻关,一是从国际观的视角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增强青年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二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旨在唤起青年大学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的使命担当意识;三是从共商共建共享视角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和理论依归,旨在引导青年大学生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感召力和实践引领力。再次,在教学思路上,一是以专题式教学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双主体作用;二是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升到战略意识的高度;三是密切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贴近学生生活,灵活采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案例式等多种方法。

(四)保障性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的可持续推进,对教师、学生及高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首

先,作为教师,除了具备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奉献精神,还要以先进教学理念为指导,不断优化教学方案、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以应对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多元困惑,譬如:怎样看待当今世界一面是美国在积极退群,而另一面的中国却在积极入群?怎样看待“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力、财力及精力上的损耗?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途?怎样看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征程中应发挥的作用?怎样看待中国积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是否会对本国民生产产生影响等。这些现实困惑倒逼教师按照基础理论、理性思维和人文关怀等多个维度构建专题教学体系,从而更好地促进知识链——素质链——思想链无缝对接,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注重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转变;其次,作为学生,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注意收集、整理和提炼那些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新的,且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善于观察周边环境的变化、发展,从而为洞悉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动向奠定基础;二要积极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善于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经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深刻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的价值超越;三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果断排除外部因素干扰,透过社会表象,探析事件衍生的内在原因和动力机制,并且尝试综合运用历史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实践逻辑推演国际利益格局和全球化趋势。再次,作为学校,为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改革各环节衔接到位,各参与主体积极踊跃,各项考评客观公正、真实有效,必须及时启动教师激励机制、学生参与机制、教学运行机制和教学考评机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各项制度规范化发展,实现教学制度的系统化建构,”^⑩从而保证诸要素良性互动,协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可持续发展。

三、注重相关教学案例积累和教学方法改进

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改革不能急于求成,除了借鉴以往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经验,还要依托教学团队,广泛积累相关教学案例,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课堂组织形式,深入研究教学规律,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还要围绕专题收集学生争论和关注的焦点,推荐学习方法、参考书目、知识拓展网站和值得观看的电影录像,尝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学案例库,实现教学思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诉求深度对接,为促进专题教学取得更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一)加强教学案例开发

教学案例库的开发对于改善课堂气氛,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求知欲与好奇心,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借助教学案例的讲解、分析、讨论,学生能够迅速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并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实现从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的飞跃。案例库开发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关知识点尽力与一带一路实践历程有效衔接,突出案例的交互性、真实性和实践性,使案例库中生硬的理论表述与实践发展历程、当前成就及未来困境相同步;其次,每个案例资源都应包括理论释义、视频讲授、讲义及教学课件等,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手机智能终端等表现形式提供丰富专题教学资源,保证大学生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使用教学案例开展学习。再次,案例库建设应充分体现目的性、真实性、生动性、完整性、层次性、动态性等特征,立足于理论传播实际,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案例内容要实用、典型、常更常新,并符合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案例库既要满足学生拓展学习,也要满足授课老师开展辅助性教学,并且使用对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教学案例进行修订和剪辑。

(二)紧跟客观环境变化

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⑬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若想取得好的效果同样要紧扣时代的脉搏,牢牢抓住学生思想实际,捕捉国际环境的新动态和新变化,广泛借鉴外脑,不断创新方法,改进教学,保证专题教学工作紧跟客观环境变化。首先,联系当代大学生思想实际,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总结一线教学经验,当代大学生对待政治课的态度通常具有两面性,既有真学真信的一面,又有似懂非懂的一面。因此,要使大学生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内涵和理论价值,不能一味地进行正面灌输,还须从反面列举一些逆理论规律的不良后果,用事实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联系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实际,增强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同感。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先后与178个国家建交,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加入了上百个政府间国际组织,^⑭而且正在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一定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武装自己,植根现实,胸怀世界,不仅要解决好自已的事情,更要立志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再次,借鉴外脑,提升专题式

教学效果。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面对的问题通常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为确保授课教师及时补充理论活水,一方面要经常聘请校外知名专家、教授进行讲学交流,另一方面要多倾听校内各领域专家、教授的指导意见,最终将这些外脑智慧运用到教学中去,不断提升专题教学的授课质量。

(三)开展师生互动教学探究

专题教学不应是教师的“独角戏”,而应该是师生集体创作的过程。师生互动教学研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好坏,它是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具体来说,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高教师理论水平。为有效开展师生互动教学,教师应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耕细作,熟练掌握基本理论,准确理解教学重点、难点和疑点,敏锐捕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时事热点问题,这些前提性预设是一名思政课教师能否在课堂上有效实现全员深度互动教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教师要开展互动教学效果评估。对照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目标,通过抽查或普查的方式,适时验收一下开展互动教学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便于研判得失和建立相应调整措施,避免出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现象。再次,要同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互动教学的本质决定了只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个人的力量是很难达成预期效果的,需要全员动员、全程联动、全方位同向同行,各参与主体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四)改进教学方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主张将人类命运寄托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也超越了主张将人类命运建立在被量化的整体幸福基础上的功利主义,而主张世界各国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着眼于人类共同价值,并将国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从一国维度扩展到全球的维度。这些重大理论创新,都需要在专题教学中,借助多元教学方法,为学生进行全方位解读。首先,借助影视作品教学法,向学生直观呈现一带一路发展成果。通常采用三种模式,一是“放映——讲授”模式,即在讲授新课之前放映影音资料,然后再组织学生围绕视频材料展开讨论,并逐步达成共识;二是“讲授——放映”模式,即先陈述发展成果,再通过影音资料展播,强化教学内容;三是“穿插”模式,即对影音资料进行分段剪辑,结合教学内容边放边讲。其次,借助问题驱动教学法,加深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结合专题教学实际,教师在遵循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前提

下,按照教学目标将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处理,然后将相应知识点转化为环环相扣、相互递进的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再次,借助情景模式教学法,增强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通过情景剧、微电影等校园文化载体,将教材中的内容或是生活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案例搬到课堂上,让学生在预设情境中,体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进而在自主体认、感悟、升华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坚实行动。”^⑮

四、克服专题式教学的不足

专题式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追求教学效果方面尽管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并非完美无瑕、无懈可击,因此在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改革时,既要充分挖掘利用专题式教学的优点,全方位提升教学效果,又要有效规避该教学手段固有不足,尽最大努力限制其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教学实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个主题,科学融入专题式教学理念,客观分析专题式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真总结专题式教学的内在规律和经验教训,全面衡量利弊得失,真正做到扬长避短。

(一)不能忽视专题式教学课程的学科性质

专题式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经常被应用在多学科教学当中,因课程所属学科性质不同,专题式教学的侧重点也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性质,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因此开展专题式教学不能过多侧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内容的讲述,否则这些专题教学就会沦为其他学科的普及式讲座或热点问题评析,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首先具有政治属性,即在开课之前要优先考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传导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为党和人民服务的问题,然后才是以透彻的学理和彻底的理论说服学生,辨析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教育引导學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其次,具有知识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种先进理论,也是一门科学,且经过自身的演进发展形成了科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像其他先进理论一样,需要借助不断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最终完成掌握群众的使命。再次,具有生活属性,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的最终目的并非用理论阐释理论,而是要用这种先进的理论去指导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实践,理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顶天”,更重要的“立地”,甚至要落地生根,这样

才能焕发勃勃生机。

(二)警惕专题式教学中出现“神散形聚”现象

专题式教学的精髓是实现教材中条块分割内容的优化整合,最忌讳的是将教材中几个临近章节进行简单合并,然后起个响亮的专题名字,文字游戏搞得轰轰烈烈,本质上却依然没有突破按章节顺序讲授的老套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题教学,充其量只能称作“假的专题教学”或者是“徒具形式的专题教学”。^⑩真正的专题式教学,首先要合理划分专题范围,而且这种划分应建立在对相关知识的全面占有和深刻理解基础上,而并非几个相关知识点的简单“拼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一定要谨防走向“形式主义”的误区。其次,每个专题都有明确的教学任务,即解决什么核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还需要建构哪些知识链,这些知识链之间怎样发挥作用,以及怎样检验是否达到了专题设计的预期效果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设置的每一个专题既要有独立的问题指向,又要建构科学的知识体系。再次,专题教学还要考虑怎样实现与同学们现有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对接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不能一味地追求“专”“精”“深”,还要考量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匹配、相融合,这样的教学才能打通教学目标与学生内心原始认知的通道,让学生主动接受而不会有被动违和之感,让原本外在的知识涌入学生的臆想中反转为内心体验的真实流淌。

(三)注重专题与专题之间的承接关系

追本溯源,专题式教学源于条块分割思想的启示,因此,这种教学手段从起源上就具有轻外延重内涵的倾向。此外,专题式教学在实施过程中,通常会由不同的教师负责不同的专题,在连贯性、逻辑性、承接性方面自然存在着先天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之前,首先要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流、核心要义、基本内容、教学目标及相关要求等进行广泛研讨,确定一以贯之的主线。其次,依据逻辑主线设置分论点,围绕分论点设置各个子专题,各子课题之间既要各自具备独立性,又要相互拱卫,努力做到内容上不重复,逻辑上不矛盾,而且各子课题之间要明确划定范围,彼此之间相互咬合,不留盲区。再次,从长期来看,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不但要处理好内部各专题之间的承接关系,还需要考虑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专题与整本教材其他专题之间的界限彻底打通,甚至对于四门思政课的所有知识点都要进行整合,统筹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题教学,统筹安排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中的案例运用,统一发挥思想政治

课教书育人的作用。^⑩尽管这需要长期的教学实践积累过程,但作为一个努力方向,可以提前考虑,并有意识地将知识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联系的内容做专题式教学尝试。

(四)谨防专题式教学中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脱轨

专题式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建构专题的初心是彰显理论的彻底性,只是在专题式教学实施过程中,容易走向就专题而专题的歧途,从而造成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脱轨。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改革过程中,首先要围绕教学实践需要设置教学专题,让教学专题指向性更强,理论的阐释力更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在进行环节设计时,应适当设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切身体验用所学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明辨社会热点、批判社会歪风的获得感。再次,在实践中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教学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式教学过程中时刻要谨记,无论专题设计多么完美,教学内容多么充实,授课逻辑多么巧妙,最终考验教学效果的还是能否经得住实践的考验。整个理论传播的过程,背后都有实践的身影,理论与实践相依相存,一旦二者之间出现脱轨,再美妙的教学方法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 ②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7.
- ③ 孙武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的实效性[J].中国高等教育,2018(21):41-43.
- ④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5.
-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5.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 ⑦ 戚如强.习近平立德树人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精神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7):35-42.
- ⑧ 张发钦,覃萍.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研究——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6):56-57.
- ⑨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 ⑩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0-11.

- ⑪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 ⑫ 赵哲,宋丹.高校教学制度建设的问题及消解途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6(21):26-29.
-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420.
- ⑭ 今日关注.改革开放40年“数说”中国外交[EB/OL].<http://tv.cctv.com/2018/12/19/VIDEOPQZBTs9eBktmK7ordGs181219.shtml>.2018-12-19/2019-03-20.
- ⑮ 颜晓峰,常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建构与实践要求[J].南京社会科学,2018(08):1-8.
- ⑯ 胡引生.专题教学是高职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之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13):50-52.
- ⑰ 姚洪越.论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与案例教学的结合[J].学理论,2012(22):157-159.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创新

张宗峰 刘明越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历经筹备及创立,初步探索,破坏和冲击,恢复与重建,改革、规范、稳定,守正创新等建设发展阶段,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在课程设置上,经历了高校政治课、高校马列主义课、“高校两课”最后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演进过程;在课程建设上,经历了由不成熟、不规范到比较成熟、规范,再到在改进中加强的演进过程。虽然曾经出现过挫折,但总体上保持着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势头,特别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取得了显著成绩。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要求,考察和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历程,对每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期能为进一步改革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历史沿革

【基金项目】上海社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捍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课题号:2018EKS002);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启明星”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与路径研究(项目号:18YJC71004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宗峰,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090);刘明越,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呼和浩特 010018)。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关键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决定在高校开设思政课,之后在不同发展阶段,为适应形势变化,持续对思政课内容进行改进,其名称也经历了“政治课”“政治理论课”“社会主义教育课”“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马列主义课”“马克思主义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等几次调整,最终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名称稳定下来,沿用至今。不论名称如何变幻,各个阶段开设思政课的初心始终未变,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品德和法律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理论教育实现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文通过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创新,概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分六个部分进行梳理和阐述。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筹备及创立(1949-1956年)

新中国的高校思政课建设历史往前追溯就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在解放区筹建的一批旨在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干部的革命性新型大学所开设的政治理论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苏联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有益做法,着手筹备和创立新中国的高校思政课,逐步形成了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思路、格局,开启了新中国思政课建设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开始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①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废旧立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包括社会发展史)三门公共必修政治课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思政课建设的初次探索。此后的两年基本将这三门课程逐步确立为高校政治课程的主要框架。1951年,教育部为了纠正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的错误认识和只有政治课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不正确看法,取消了“政治课”这一称谓。1952

年,“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确定了不同类别高校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年级次序,课程内容仍以1949年确立的三门课为主,要求各类高校及专修科从1953年开始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1953年,为避免“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内容与“政治经济学”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以及高中阶段“共同纲领”课程之间的交叉和重复,高等教育部决定将“新民主主义论”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为促进政治理论课适当与专业结合,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9月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初步形成了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以及“政治经济学”构成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确立了不同类型高校和专业开设政治理论课的学年时间及顺序;在有些院系,政治理论课同时又是专业基础课,比如“中国革命史”以及“马列主义基础”为历史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政治经济学”算是财经类专业的专业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系的专业课,对这些算作专业课的课目开课时间不作统一要求,由培养单位自行设置。由此,高校政治理论课发展为四门课程,又称为“旧四门”,这也标志着新中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初步创立。

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初步探索(1957-1965年)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这对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在此情况下,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提出新设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主要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1958年,为扭转政治课教学目标不明确,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改造思想,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教条主义和歪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倾向,实现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目标,将1956年确立的四门政治课停止开设,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并规定以后政治课一律开设三门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代替之前的“中国革命史”以及“苏共党史”)以及“政治经济学”。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政治课的重要任务演变为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进行斗争。1958年批评政治理论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必要的,但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

学习,取消四门作为科学的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只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无论是对高校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都大打折扣,于是1961年又重新恢复了“马列主义基础”课。1961年,教育部出台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确定了高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另一个是“形势和任务”,并分别规定了不同学制的高校和不同性质的专业开设这两类政治课程的门数和学时。1964年,中宣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文,提出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对课程和教材进行了改进,确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架构,形成了由“哲学”课、“中共党史”课、“政治经济学”课以及“形势与任务”课构成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三、“文革”时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破坏和冲击(1966-1976年)

“文革时期”很多领域受到破坏,教育领域首当其冲,尤其高等教育更是遭受严重冲击和破坏,高校政治理论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1966年“五·七”指示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要求,并开展了大规模教育革命的实践活动,但这不仅没有推动教育发展,反而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冲击,高校政治理论课遭到严重破坏,极大败坏了声誉。从1966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全部停止招生,停开所有课程。鉴于停招停课的局面,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学唱《国际歌》等歌曲,提高阶级觉悟,破私立公等。1970年6月,中央批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以及教育革命的实践,这两所高校已经具备了招生的条件,在学习内容上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②根据这个文件精神,从1970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要内容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结合毛主席著作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原著,但其指导思想 and 基本内容是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在这期间的招生主要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及青年干部中推荐选拔,所以又称这些学生为“工农兵学员”。即使在复课以后,高校政治理论课仍然未能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尽管形式上也是在进行政治理论教学,但经常受冲击,基本是“以战斗

任务组织教学”，以“革命大批判”取代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难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政治理论课遭受严重干扰破坏，正常的教育教学无法得到保证，直到1977年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高考制度恢复，高校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才逐步回归正轨。

四、“文革”结束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恢复与重建(1977-1978年)

“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担任的职务。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即以教育、科技为突破口开始拨乱反正，召开了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亲自抓教育和教材建设，通过拨乱反正使教育战线出现了新局面，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高校政治理论课也开始逐步恢复与重建，走向正轨。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对我国教育工作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日后教育的目标、任务、方向进行了顶层设计并针对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期待。会议期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属性和功能进行了定位，赋予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属性，规定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目的、任务，并对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予以重新调整。在课程体系上，按课程顺序依次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课、“政治经济学”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这四门课程，前三门要求所有高校都要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要求文科开设，理工农医专业有条件应开设“自然辩证法”。上述几门政治理论课各有其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不得随意取消或占用，因特殊情况占用理论课教学时间的，必须补上。通过此次调整和设置，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得以恢复和重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和全国工作的中心和重心都发生了转移，相应地高校政治理论课也将教育教学的重心和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政治理论课转变了学生思想，保证理论教育的正确方向，为进一步办好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规范、稳定(1978-201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政治理论课教师解放思想，拨乱反

正,改进教学,有力推进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并使之不断趋向稳定和规范化,取得了较好成效。当然,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不少实际困难。为逐步克服困难,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高校政治理论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作用,1980年,教育部印发了“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③规定马列主义课在各专业中都是必修课,不能选修或免修。强调要处理好马列主义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在教学为主的原则下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工作,结合国内外局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讨新课题,努力以科研辅助教学。一些高校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设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1982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性质为必修。随后,教育部组织制定了高等学校“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学大纲”(试用版),并不断在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修订和完善。政治理论课的称谓也开始逐步演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这也是后来“两课”名称的雏形。针对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国家教委出台了在高校进一步贯彻落实的方案,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中国革命史”课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课构成的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并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形成了“85”方案。从课程变化上看,“中国革命史”是总结清华大学等高校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的试点经验而推广开设。新开设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主要通过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新思想、新政策、新理论,让学生充分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青年一代的密切关系和责任使命。如此设置,深刻反映了改革发展新形势对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新要求,及时以党的十二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生头脑。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阵地,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1993年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教委联合下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确立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两类课程构成,高校思政课进入“两课”时代,赋予“两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责任和使命。1996年3月,在“全国高校‘两课’管理工作座谈

会上,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强化“两课”声音,深化“两课”改革,加强“两课”管理,使“两课”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为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1998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通知”,规定各高校从1998年下学期开授“邓小平理论”课。1998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高校“两课”的课程设置作了统一要求和规范,形成了“98”方案。以本科为例,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毛泽东思想概论”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以及文科类开设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由“思想道德修养”课和“法律基础”课构成的思想品德课。“98”方案对高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调整,是贯彻十五大精神,解决好把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提高“两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改革举措,有效增强了对高校学生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

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要求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及时全面地将十六大精神反映到教材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揉进课堂中。为实现这一重要政治任务,2003年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把“邓小平理论概论”这门课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调整,名称改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从2003年下半学年开始开课,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单独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试点。2005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基点完善高校思政课程体系,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出台,公布了高校思政课的课程设置具体方案,并将课程名称简称为“思政课”,结束了“两课”的称呼。本科“思政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这4门必修课,以及1门“形势与政策”课,形成了“4+1”的“思政课”课程体系。专科的课程设置为“概论”和“基础”另加一门“形势与政策”课。至此,“05”方案形成,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趋于稳定和规范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并对体系范围进行了规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的要求,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高校思政课修订本教材,并要求全国高校统一使用。为落实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009年修订版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政课的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2011年1月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为高校思政课课程建设提供了标准化依据。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学习十八大精神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推进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2013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中央“马工程”专家对高校思政课教材进行修订,形成了2013年修订版,进一步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高校思政课改革发展全过程。

六、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在改进中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及时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充分体现十八大以来的最新理论成果,2015年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高校思政课教材2013年修订版作了再次修订,形成了2015年修订版。

为改善高校思政课教学状况,加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2015年7月,中宣部、教育部推出了“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整体推进教材、教师、教学等方面综合改革创新。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政课的顶层设计,规范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2015年9月,教育部对2011年印发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为总结高校思政课建设经验,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创新,2015年12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会议”,组织落实“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综合改革创新,推动高校不断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

为更好地在改进中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教育部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门研究审议通过了“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总体方案”,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充分发挥课程等十个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构建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等“十大”育人体系,推动“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促进专

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尤其是“课程思政”建设经验,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2018年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了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现场推进会,强调完善课程设置管理、课程标准和教案评价制度,实施高校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创新计划,创新高校思政课建设体系。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国家指导思想。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中宣部、教育部组织对高校思政课教材进行全面修订,形成了2018年修订版,及时推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为继续打好新时代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水平的攻坚战,2018年4月,教育部提出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了方向和举措。2019年3月,中央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④作用不可替代。怎样将思政课的“有意义”讲得“有意思”,既有思想性、理论性,又有亲和力、针对性,以“八个相统一”给出了答案。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对思政课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创新,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鼓励全国重点马院率先全面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为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视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开好思政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把我们党对开好思政课的规律性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全国高校把开好思政课作为铸魂工程、战略工程来抓,推进思政课内容和方法改革创新,思政课铸魂育人功能不断增强,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政治引领、价值引领作用。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政课开设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始终是新中国高等教

育的主干核心课。经过70多年建设与探索,高校思政课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和比较规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主阵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要求,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对于在改进中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不断提升教学实效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①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
-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433.
- ③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35.
- ④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第1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教材 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史春林 徐绍元

【摘要】 目前高校正在使用的国家统编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经过6次修订日益完善,但目前该教材的总体结构框架以及各章、节、目的具体结构框架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适当调整。同时该教材某些史实与观点表述应注意清晰性、完整性、照应性、权威性与准确性。另外,在学术规范方面还应增加页下注释并注意准确性以及课后阅读参考文献的准确完整性,避免使用禁用词与出现文字错误。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结构框架调整;史实与观点表述;学术规范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重大研究专项(L15ZDA002);辽宁省教育厅教研项目“新时代中国革命精神‘四位一体’教育教学模式研究”(101512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史春林,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绍元,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 116026)。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教育部明确指定的全国高校公共基础课教材之一,自2007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后,分别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5年与2018年进行过6次修订,使该教材日益完善,较为及时反映了我们党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到目前已成为一部质量较高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相当广泛的影

响。教材是教与学的基础、前提与依据,应具有准确性、科学性、政治性、严谨性、完整性等特点,但最新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以下简称《纲要(2018年版)》)教材在结构框架、若干史实与观点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与修订。^①

一、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结构框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目前《纲要(2018年版)》教材除了“导言”与“后记”外,分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两大历史阶段以及上、中、下三编综述,共计11章。从结构框架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一方面,总体来看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调整。该教材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现有章、节、目无论是标题名称,还是具体内容都主要集中于政治、革命与战争等领域,而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则显得相对薄弱,如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在提到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时,只简单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如此安排显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全貌,进而会影响学生对整体国史与国情的全面了解,不利于增进“四个自信”。因此该教材再修订时应适当增加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如上述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可适当增加建国初期移风易俗进行社会改造的内容,对当时废除娼妓制度、实现妇女解放、禁绝鸦片烟毒、树立新型社会风尚、宗教制度改革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等内容进行全面阐述,让大学生能够多角度、多层面地了解国史与理解国情。特别是应增加有关文化史的内容,帮助大学生增进文化自信。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我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②这样,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从目前教材总体框架与具体内容来看,对道路、理论、制度等方面阐述比较丰富,有助于大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进而有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此基础上,教材还应适当增加有关文化建设的内容,如第八章第三节第四目“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目前第一个子目是“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可在该子目后面专门增加一个子目“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全面阐述建国初期改革旧教育制度与教育事业发展、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建立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开展以及科技事业的初创、文化艺术的推陈出新、卫生事业的发展、体育事业的崭新局面等内容,同样其他章、节、目也要相应增加有关文化建设的内容,这样才有助于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具体来看有些章、节、目结构不合理,应做适当调整。该教材有关章、节、目不合理,甚至存在标题表述不准确、内容前后重复以及文不对题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

其一,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第二目的标题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该目下共有两个子目:

第一个子目的标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一是谈了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表现、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一书的基本主张;二是谈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早期维新与启蒙思想。由此可见,该子目下的这两项基本属于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内容,因此,建议将这个子目调整到第二章,作为第二章的第一节,目前,教材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依次改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

第二个子目的标题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救亡图存的主张。这些内容与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的第一个子目“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部分内容重复,因此,建议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救亡图存的主张调整到第二章第三节第一目的第一个子目中去。二是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内容又与第三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一个子目“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的部分内容重复,这里再次谈了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及其纲领问题,因此,应把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等内容调整到目前教材第三章第一节第二目第一个子目中。

这样,经过调整后,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应改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失败”。

其二,第三章的标题是“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根据该标题,1912年2月清帝退位就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但实际上该教材后面又继续写了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挽救共和的努力,一直写到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而这些内容都是目前第三章的标题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应把第三章的标题改为“对国家出路的继续探索”,这样既可涵盖第三章所写的全部内容,又可照应前面的第二章,因为目前第二章的标题是“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既然有“早期探索”,就应有“继续探索”,这样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其三,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目的标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但内容却只写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第一次护法运动”。众所周知,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才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如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曾明确指出,1922年“第二次护法斗争又告夭折。孙中山遭受了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没落。”^③因此,应把“第二次护法运动”补充到该目下。

其四,第四章的标题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显然这主要是指我党成立,但实际上该章总共有三节,分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由此可见,第四章的标题无法涵盖国民革命等内容,因此第四章的标题应改为:“开天辟地大事变与国民革命运动”。

其五,第八章第一节第一目的标题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该目一开始谈了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四个严峻形势,之后谈了我党和人民政府主抓的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三个工作“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第四个工作“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显然这两项工作并不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主要工作,因此,应把该目标题改为“建国初期严峻考验及其应对”。

二、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 若干史实与观点表述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纲要(2018年版)》教材还有一些史实表述不够准确,需要作进一步修订,同时有些观点与提法也值得斟酌和商榷。

第一,有关表述应注意清晰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关表述极为笼统、含混,虽然表面来看没什么错误,但会使学生不得要领,产生不必要的疑问。因此该教材再修订时,须对有关问题叙述要进一步具体与明确。如第九章第三节第二目第二个子目“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中写道:“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④在这里写得比较模糊,最好应具体指明: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该规划在1962年提前完成。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样表述才清晰,便于学生对两个科技规划“提前实现”与“提前制定”的理解与掌握。又如第十章第二节第三目第四个子目“对外工作在打破对华‘制裁’中全方位推进”中有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又根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提出正确的方针,使党和国家在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应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⑤在这里,学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邓小平提出的正确方针是什么?对此,教材应给予说明: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

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第二,有关表述应注意完整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的知识点表述不全面,给学生造成一定困惑,甚至以偏概全,因此有关表述应注意全面与完整。

一方面,要注意有关过程的完整性。如关于解放战争我党土地政策演变的过程,该教材第七章第二节第二目只重点介绍了《五四指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这种表述极不完整,甚至连当时非常重要的土改总路线都没写。《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它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该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会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对此,1947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土改“必须注意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⑥随后我党和各解放区对土改政策做了许多更加完善的规定与说明,如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了《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示将这两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轨起了重要的作用。”^⑦在此基础上,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⑧这样叙述,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政策的演变过程,而且重点突出,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我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对此,该教材应适当补充。

又如关于建国后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转化过程,第八章第二节第二目在谈到1949-1956年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时是这样写的:“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的了。”^⑨那么,在这里学生会有这样的疑问:1949-1952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是什么?不得而知。实际上,建国头三年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正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所说:“新中国成立

伊始,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的矛盾。”首先要做的是完成肃清国民党军队的后期作战,解放中国的全部国土;其次是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和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⑩因此,该教材应据此对1949-1952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基本任务进行补充。

另一方面,要注意有关评价的完整性。如第三章第三节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概括了其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的弱点: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根据大多数有关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应有重要一点,即没有建立自己领导的强大武装,所以其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只能依靠新军、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以及搞政治暗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虽然领导了两次护法运动继续奋斗,但基本上仍是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结果毫无例外都失败了。正因为如此,后来孙中山才下定决心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该教材应把没有建立自己领导的强大武装这一点进行适当补充,这样可使学生更全面、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同时也可为学生后面在第四章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

第三,有关表述应注意照应性。《纲要(2018年版)》教材有的表述不太注意前后照应,给学生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应注意知识点的连续性,前后呼应,使学生能准确了解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

其一,第五章第二节第三目第二个子目“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有这样一段话:“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⑪对此,学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毛泽东为何要“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强调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该教材在此之前却没有任何交代。实际上,1928年12月毛泽东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肯定了农民对分得土地的权利,但由于受经验缺乏等因素的影响,该土地法存在两个缺点:一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土地,这样容易侵犯中农与富农利益;二是规定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禁止土地买卖,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样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对上述第一个缺点做了原则性纠正,即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对于

土地所有权问题,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通告明确提出,农民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⑫在此基础上才如上面教材所说,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经验,在1931年2月27日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做出了上述要求。因此教材应据此修订,这样才能使学生清晰理解当时我党土地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

其二,第六章第二节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意义时写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⑬对此,学生会有这样的疑问:这里所谓的“新高潮”是相对于哪个事件来说的?但从目前教材这节所写内容来看不得而知,实际上应指“珍珠桥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1931年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与当地学生共3万多人举行联合总示威,但游行队伍在珍珠桥附近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造成3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游行队伍被冲散,这次各地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的总示威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高潮,但珍珠桥惨案后国民党当局下令各地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救亡运动暂时陷入低潮,因此后来才有“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这一提法。^⑭对此,应在第六章第二节第二目“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中适当补充“珍珠桥事件”相关内容,以便前后呼应。

其三,第七章第四节第三目第一个子目有这样一句话:“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⑮但是在第七章第四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在谈到北平和谈时并没提到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张治中。对此,应加以补充说明,以便前后照应。

第四,有关表述应注意权威性。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应与时俱进,广泛、充分吸收学术界特别是官方的最新观点。如该教材第九章第二节第二目第五个子目“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评价华国锋结束“文革”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⑯而第十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对此评价却是这样写的:“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⑰对于同一个问题,一个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却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自相矛盾,让学生

无所适从。那么,应以哪一种说法为准呢?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后,8月30日新华社发布了《华国锋同志生平》一文,明确强调:“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⑮这应是目前对华国锋最权威的评价。教材应以此为准,以免对学生在思想认识上造成困惑。

第五,有关表述应注意存疑性。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新发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些问题存在争议,会有不同的说法,但该教材在阐述时往往只提一种说法,而不顾及其他说法。这样的话,如果教师按照教材的说法去讲课,而有的学生如果在课外看到了同一个问题的其他说法,往往会质疑教师讲课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甚至会怀疑教师的水平,这不仅会使教师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而且还会影响到教材与课程的权威性及公信力,进而影响教学效果。对于这样的问题,教材最好是模糊处理,或是存疑。

其一,第二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三个子目“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有这样一句话:“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⑯但关于洪秀全的死因,除了上述说法外,目前学术界还有“自杀说”,包括服毒自杀与吞金自杀两个版本。^⑰因此关于洪秀全死因最好是模糊处理,只提洪秀全去世,或在页下注释对其死因予以说明。

其二,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在讲黄花岗起义时有这样一句话:“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大部在激战中牺牲。其中72位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⑱在这里有一个历史误会,原来所谓的黄花岗72烈士包括李文楷,但当时李文楷并未牺牲,4月27日起义当天他正在香港治病。1922年黄花岗72烈士立石记名时,李文楷在报上看到其名字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专门写信特向有关方面说明自己还健在。^⑲对此,有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活烈士”乃是由于当时形势复杂,广州起义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广州人民冒着极大风险多方设法来收殓尸体,一时并未查清事情真相。^⑳对此,该教材应在页下注释予以说明。

其三,第三章第三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中有这样一句话:“1913年,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㉑这种说法只是学界的一种传统观点,对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袁世凯的传统指认是缺乏真实依据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㉒另外,目前有学者认为是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所为;^㉓还有学者认为是陈其美(前沪军都督)所为;^㉔张永则认为“宋案的发生大体是会党分子卤莽制造的

一次意外事件。”²⁸实际上,宋案迄今依然迷雾重重、扑朔迷离、争论不休,对此侯宜杰认为:“研究宋教仁被刺案,要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原则。缺乏确凿证据,就不能认为赵秉钧或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纵然有些问题没有搞清,也只能存疑,不能作为定论。”²⁹因此,教材最好只提宋案的发生,而不提主谋是谁,这样处理较为合适。

其四,第六章第二节第四目第一个子目“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在谈到1937年陕甘宁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改称时指出:“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³⁰是“特区”还是“边区”目前学界有争议,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就指出:“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³¹对此,教材应在页下注释予以说明。

三、关于《纲要(2018年版)》教材学术规范问题及其完善

《纲要(2018年版)》教材作为一部国家统编教材,目前有几百万大学生在使用,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因此应在学术规范等方面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但其在学术规范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改进。

第一,应增加页下注释并注意准确性。该教材页下注释比较简单,目前只对“资本—帝国主义”“斗、批、改”“两个凡是”“两岸直接双向‘三通’”等少数几个专有名词做了解释。而该教材正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与引文,而这些数据与引文却没有一个页下注释。这种写法既不严谨,也不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不利于有关教学。因此应增加页下注释,对有关数据与引文等来源要详细、准确列明具体出处,以体现教材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同时也便于感兴趣的学生查找相关史料,进行扩展性自学。而且在做页下注释的时候,引文和注释的出处一定要精准,如该教材第四章第二节第一目第一个子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在谈到陈独秀时有这样一句话:“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命运’。”³²但经核对,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中根本没有“乃不可逃的命运”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出自陈独秀在1920年10月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原话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³³由此可见,该引文不但出处错误,而且引文也不准确,在做页下注释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类似的错误。

第二,应注意课后阅读文献名称准确完整性。该教材在每章之后都列出了学习本章的

“必读文献”与“延伸阅读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教材目前缺少页下注释的遗憾，但这些阅读文献有的名称并不准确完整，与目前权威部门公开出版的文献名称不太一致。如第十一章课后第2个必读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10月)”，而据《人民日报》当时正式发表的名称应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④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情况，需要核对订正。

第三，应避免使用禁用词。2018年新华社在《新闻阅评动态》第315期发表的《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禁用词(第一批)》中规定了一些禁用词，其中提到一般不用“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提法，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或“1949年前(后)”提法。据此，该教材中编综述的标题“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第七章的标题“为新中国而奋斗”、第七章第四节标题“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下编综述的标题“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下编综述第二节的标题“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及其相互关系”以及正文中提到的“新中国”都一律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该教材正文中多次提到的“解放前(后)”也要根据新华社的要求做相应的修改。

第四，应避免出现文字错误。如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第二个子目在谈到清末新政内容时指出：“裁撤象营，建立新军”，^⑤根据有关清末新政研究成果，这里的“象营”应是“绿营”。^⑥

总之，期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再修订时能对上述有关问题予以关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使其体系科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史实可靠、表述完整、观点正确、学术规范，真正成为权威与精品教材，充分发挥育人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① 自2007年该教材出版以来，有关学者就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1.赵朝峰：《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的几点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2.李文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争议问题指正》，《学术界》2008年第6期；3.张建城：《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分编的看法》，《历史教学》2008年第14期；4.秦立海：《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内容的若干思考》，《历史教学》2008年第20期；5.刘佰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若干问题的思考》，《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6.王德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革的思路研究》，《铜仁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7.尹业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修改意见和建议》，《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8.尹业香：《可信·鉴今·育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纲要〉(2013年修订版)“中编”内容的修改建

议》,《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9.尹业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编)的若干意见和修改建议》,《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10.程敬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三则史实辨析》,《思想政治课研究》2018年第3期等。该教材经过6次修订后,到目前已吸收了上述学者的部分意见。在此基础上,笔者在上课时根据学生提出的疑问,在研读该教材2018年版时又发现一些其他问题需做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 ③ 国家教委社科司.中国革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22.
- ④⑤⑨⑪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6,298,231,138,154,207,267,283,46,68,73,156-157,109,61.
- ⑥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1,1314.
-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56-758.
- ⑩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31.
- ⑫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282-286.
- ⑭ 刘婧.回忆“九·一八”事变时的学生爱国运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6):37-39.
- ⑰ 华国锋同志生平[N].人民日报,2008-09-01(4).
- ⑳ 陈力.洪秀全死因考论[J].广西社会科学,2014(10):109-111.
- ㉑ 屈殿奎,李文楷.黄花岗烈士中的“活烈士”[J].党史文汇,1995(7):31.
- ㉒ 黄乃管.烈士又活四十八年——记黄花岗烈士李文楷[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56-58.
- ㉓ 苏智良.袁世凯与北洋军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69-570.
- ㉔ 马勇.重新认识近代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12.
- ㉕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309-310.
- ㉖ 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J].史学月刊,2006(9):48.
- ㉗ 侯宜杰.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J].史林,2013(1):125.
- 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26.
- ㉙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2.
- ㉚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N].人民日报,2017-10-29(1).
- ㉛ 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432.

基于“精准”思维提升高校思政课的育人效能

张晓明 郭文君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青年学子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提升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新时代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于“精准”视域下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困境进行精准定位、精准设置、精准发力、精准服务,积极发挥领航正向的功能,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铸魂育人,引导青年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到学生心坎里,使其成为一门真正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课程。

【关键词】精准;思政课;育人效能

【基金项目】2019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时代新人坚定文化自信的科学导向研究”(SC19EZD04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晓明,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郭文君,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充 637002)。

“精准”一词取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他指出,要想真正扶贫必须找出贫困之根本所在并落实于实际行动,切不可盲目扶贫,以“精准”为重点。^①思想政治理论课亦如此。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给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思政课传统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及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使得“大水漫灌式”教学已不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获得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使课程真正融入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

际,这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找准改革的突破口,立足实际,努力做到精准定位、精准设置、精准发力、精准服务,把思政课真正建设成为一门启人心智、铸人灵魂的课程,使之成为学生学习成长中的一盏明灯。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关键课程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

(一)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教育既不是资本主义教育也不是其他什么教育,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教育,则必须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办学方向、关系到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大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帮助青年学生理解党的历史使命、认同党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行动纲领的重大任务。^③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社会转型下的各种社会思潮暗潮涌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为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急需发挥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作用,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牢牢占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对大学生有效地进行价值引领、责任担当教育,帮助其破除来自思想层面、实践层面的难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神圣使命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立志投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青年。而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在身心发展方面表现出双重特点:一方面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接受新生事物快、参与意识强等,他们的这些优势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青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又被称为“狂风暴雨期”,其人生阅历较狭窄,遇事容易冲动,难以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做出正确抉择。同时青年群体还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重点对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干扰了青年人正确“三观”

的养成。能否帮助青年群体养成正确“三观”,关系到能否为党和国家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青年的价值观教育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④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以帮助青年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为立足点,以引导青年大学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为根本内容,以帮助青年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树立正确的“三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动力为总基调。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新形势、新要求、新考验以及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提供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挑战。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以便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精准施策。

(一)教学主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首先,一些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认识不足。教师和学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两个主体,思政课程有效性的提升需要教师和学生同时发挥作用、互相配合。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不难发现一些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主观认知的偏差,仅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作国家政策的“传声筒”和“扩音器”。因此,一些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高大上”而将其束之高阁,敬而远之。与此同时,教师和一些学生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下更多地表现出功利主义取向,他们重视实用性强的专业课程而忽视价值观念塑造的课程,从而造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无用课程”的假象。

其次,各类课程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参差不齐,尚缺乏协同育人意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素质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因素。但不难发现在传播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教师对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存在一知半解,甚至把西方盛行的“反马”“非马”观点奉为主流,在课堂上大肆提倡,混淆是非观念。不同学科或专业的一些教师缺乏协同育人的大局观念,没有注意与其他课程在教育上的同向同行,反而秉持着“各自为营”“单打独斗”的育人理念。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与发展,而且还会给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带来困境。

最后,教师自身教学能力不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不仅是科研

和学术造诣高的学者,更应该具备扎实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部分教师道德教学能力与其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他们或者安于现状,不能根据新情况及时更新课件,改进教学;或者授课方式老套缺乏新意,不懂得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学,存在“读讲稿”“念PPT”等现象,或者只是机械讲授“规定内容”,秉持“唯书论”,既不关注学生发展情况,也不回应学生的学习期待。其结果不仅使教师讲得费劲,还使学生听得没劲,从而失去学习积极性。

(二)客体增加的教学难度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增加了教学难度。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抽象的理论内容不利于教师的形象化教学,也不利于学生掌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既是马恩对历史现实的高度概括又是其高超学术造诣的体现,而当代大学生既缺乏当时的时代知识背景又缺乏一定的理论素养,很难对其思想精华进行恰如其分的解读,理所当然会觉得生涩难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一生的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浩如烟海,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完从马克思到习近平的著作。^⑤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于其他专业课,是思想、政治、理论三位一体的课程,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理论成果由于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政治性和政策性强的内容容易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太“高大上”,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从而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

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包括基础内容,还包括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法律等多个领域,从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才能形成一种较高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征,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瞬息万变的网络大环境中抓住主流思想并及时把反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创新成果传递给学生,这个过程使教学具有挑战性。^⑥这就需要教育者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趋势,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学习新思想、新观念并及时向教育对象传递新信息。

最后,思想塑造见效慢。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上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众所周知,思想的塑造非一蹴而就,是一个潜移默化、长期不断进行量的积累的过程,这样一个漫长的思想塑造过程难以满足急功近利的诉求从而很容易被轻视。

三、基于“精准”视角下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整体筹划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突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困境,进行精准施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还需在“精准”上下功夫。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立足“精准”,始终坚持精准施策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曾多次强调精准思维的重要性,明确提“要对准瓶颈和短板,精准聚焦、协同发力”。^⑦“精准教育”旨在强化问题意识、目标意识、实操意识、到位意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在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环节上精准聚焦和精准发力。^⑧

(一)精准定位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网络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结合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目标实现好,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需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每阶段的不同要求精准定位。

首先是角色精准定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传统的思政教育者凭借信息优势在教育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发号施令”,而受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则处于受支配地位,机械地执行“命令”,从而呈现僵化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僵死的教学模式。另外,一些教师存在弱化、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象,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用性不强,或者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推给思政课教师。这些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教学过程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需要教师从角色上开始转变:摒弃以往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形象,与学生平等相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与发展不是思政教师唱“独角戏”,既需要学生的配合,也需要各级各类的教师共同承担为党和国家育人的责任。因此,各级各类教师应该重新定位角色,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传授专业知识与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相统一。只有每个群体同频共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才能为共同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是目标定位。目标起着引航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亦如此。育人目标不明确,就不能保证育人质量,那思想政治理论课就算失败了。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始终围绕着立德树人这个根本目标,坚持为党和国家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只有

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才能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⑨引导青年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民族的伟大梦想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

最后是内容定位。所谓内容定位意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因此,选择内容应注意:第一,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在遵循人类社会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的前提下选择难易程度适中的理论内容,让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第二,思想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现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应该局限于教材,而应既立足历史、又立足于现实生活,对教材进行处理、加工、创新。具体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内容,又要取材于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就联系现实生活而言,它可以以国内外时事政治为内容,也可以以发生在学生周围的小事件为内容,这样课堂教学才能既视野开阔又接地气,促进学生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

(二)精准设置

精准设置才能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校管理部门立足实践,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精心做好教学方式的选择、评价机制的设置,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育人目标提供保证。

首先,精心选择教学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应限于课内学习,要以课内学习为基础,课外学习为补充拓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突破传统的班级授课方式,让学生在实践考察中感受国家的变化与发展,在实践中验证真理,获得真知。思想政治理论课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把多媒体技术与传统课堂相结合,实现网上网下教学相结合、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促进“灌输式”教学向启发式教学转换,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不同的教学方式各有利弊,这需要教师辩证看待,取长补短,综合选择最佳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最佳效益。

其次,设置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是学校管理教师和学生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合理的考核方式不仅能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还能提高教学质量。要建立多元评价机制,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绩在教师职务职称评聘标准中的占比,坚决克服唯论文、唯文凭等问题。制定定期考核计划,对多次考核不合格的思政课教师实施退出机制。这种评价方式有利于纠正以往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做法,使教师同时兼顾二者,不能厚此薄彼。除此之外,学生的考核

信念、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否德才兼备等标准进行。在教师队伍配备上既要坚持精简、高效、协调、务实原则,又要坚持专兼职结合的原则,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知识结构上都要进行合理配备,实现年龄梯次配备、任职经历复合、专业特长互补,使教师队伍充满生机与活力,更好地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三)精准发力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水漫灌式”的思政教育方式已不能有效地供给和满足教育对象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⑩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聚焦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思维,牢牢抓准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与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精准发力。因此,广大教师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首先,提升理论水平。“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必须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素质建设。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必须具备一桶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教师六要”,系统回答了一个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⑪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教师的人文素养、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涵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息息相关。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需要教师保持一种学习永远在路上的心态,坚定“非学无以广才”信念将自己打造为一泓源源不断的活水。既要学懂弄通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知识,又要广泛涉猎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相关的理论知识。另外,科研与教学是辩证统一的,教师除了是教学能手还应该是科研能手。只有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才能用学术讲政治,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和理论的说服力。无论是扎实理论功底还是提高科研与学术能力,都需要增强学习。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下工夫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的著作,还要广泛涉猎各门学科,博闻强记、博览群书,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引经据典,将枯燥的理论知识转化成鲜活的生活实际,使其通俗易懂。^⑫

其次,勇于创新。创新就是突破旧的思维模式,改造老事物形成新事物的过程。一个国家只有创新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一门课程也只有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与发展仍面临众多困境,既有来自理论层面的也有现实层面的。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迫切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以及学生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疏远的师生关系亲近化、单一的教学模式多样化。要引导学生学习新东西,体验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消除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偏见或抵触情绪,引导学生善学

善思,善做善成。这就要求教师要进行观念创新,敢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旧的思想观念,不唯上、不唯书,秉持因势而化、因时而进、因事而新的观念;要创新关系,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实现高效课堂的一剂良药。沉静的课堂教出的是听话的学生,而活跃的课堂培育的是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教师要为人师表、做好表率。教师要根据当代大学生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特点,在传统教学中融入网络教学等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实现课堂的创新。要建立科学的课堂管理模式,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并非来自教师单方面的“严管”,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管自己。因此,教师应该多把课堂让给学生,把学生作报告、小组讨论或者问答比赛的参与度计入期末考核,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

再次,探索多种教学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关键。毛泽东曾做过如下比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一顿瞎说。”^⑩这一比喻告诉我们任务的实现不仅需要方法还需要好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的任务艰巨而重大,需要灵活选择各种教学方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变得有滋有味。方法的灵活性既要体现内容的针对性,又要关注学生的可接受性,应遵循“沿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的原则,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学生情况、时间地点、授课方式来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避免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

最后,倾情投入。教学相长的过程也是师生情理互动的过程。唯有教师倾情投入、融入情感进行有温度的教学,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第一,教师要主动关注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而进行针对性教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者忽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从而部分学生未获得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遵循青年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教书育人规律的前提下坚持“因材施教、因势诱导”,有所侧重地给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提出不同的教学任务,从而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均有所获。第二,理论讲授既要追溯历史又要聚焦现实,既要讲好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精神,又要讲出信仰的味道;要用语言的魅力去吸引学生,讲授中坚持语音语调声音高低起伏,面部表情丰富,肢体动作协调。第三,教师不仅要成为学生汲取知识的引路人,还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心灵导师。这需要教师始终关注、关爱、关心学生,着眼学生的现实需求,回应学生的成长困境,解决学生思想上的难题,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教师要努力讲好每一次课,利用好每一次谈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触及学生内心,实现科学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青年大学生心中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

四、结 语

有难度才有挑战,建设好有难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了党和国家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培养人才的坚定决心。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教师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用教师“六要”审视自己,同时还要善于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明确时代责任、清晰定位自己的角色,把“讲得清、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作为自己的授课原则,不断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新模式。另外建设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也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积极配合,只有两者同向发力才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使其成为学生终身受益的金课。

【参考文献】

- ① 樊丽霞,杨映礼,尹芳等,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创新策略研究[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9(11):55-57.
-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 ③ 孙兰英.新时代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指南[J].红旗文稿,2019(08):14-16.
- ④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5-05(1).
- ⑤ 白显良,陈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努力提升学术品位[J]. 思想理论教育,2019(07):60-65.
- ⑥ 刘建军.怎样才能上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J].求是,2019(08).
- ⑦ 习近平.推动改革举措精准对焦协同发力形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 [J]. 中国科技产业,2016(04):1.
- ⑧ 吴满意,王丽鸽.从精准到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根本态势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4):198-204.
- ⑨ 郑洁.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与针对性的路径[J].高校辅导员,2017(05):16-20.
- ⑩ 吴满意,景星维.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J].学术论坛,2019(05):133-139.
- ⑪ 莫岳云.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遵循[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4-25(001).
- ⑫ 邹礼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思路[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234-237.
- ⑬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